

編 者 的 話

今天，在我們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广大工人、貧农、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都成了国家的主人，并且正在意气风发地为把我国建成偉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进行忘我的劳动。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毛主席教导我們：“千万不要忘記阶级和阶级斗争。”

在毛主席的偉大号召下，在城、乡开展了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我們东北地区 and 全国各地一样，广大劳动人民回忆过去，对比今天，写出了許多家史、村史、社史、工厂史，以及其他各种专题史。这些史料揭露了旧社会統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压迫，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在解放后当家做主和过着美滿幸福的生活。这些史料，是进行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活教材。它能够使我們（特別

是青年一代) 了解什么是旧社会, 什么是剥削和压迫, 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它能够使我们不忘过去苦, 憎恨旧社会, 从而更加热爱今天, 热爱党、热爱毛主席。这些史料同时可以进一步启发我们继承并发扬老一辈的光荣的革命传统, 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派, 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 艰苦奋斗, 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为了更好地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我们从东北地区的“四史”材料中选出一部分, 编成《东北地区四史丛书》, 陆续出版。由于编辑水平所限, 加上这是一项新的工作, 缺点和错误一定难免。我们热情地希望读者提出批评, 以便把这套丛书编得好些。

編 者

1965年2月

目 录

編者的話

人力車工人的苦難.....	1
揮淚憶苦唱今歌.....	15
江湖流浪盡艱辛.....	27
一個女售票員的遭遇.....	34
廚師今昔.....	46
筵席旁的辛酸.....	53
徒工的苦難.....	60
理髮工人見新天.....	67
修腳工人的今昔.....	77

人力車工人的苦難

——旅大市三輪車工人柴鶴仙的家史

史力群 辛德功 整理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大、中、小城市里，不論是严冬酷暑，还是刮风下雨，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力車工人，为了換得一口飯吃，象牛馬一样，拉着洋人、汉奸、特务、闊佬們，在大街小巷奔跑。

当时，在大連人力車工人中流傳着这样几句順口溜：

“提起拉‘洋車’^①，

处处受折磨，

賊欺刑警詐，

有苦向谁说。”

这是人力車工人，对那个万恶的旧社会的控訴。

三輪車工人、旅大市劳动模范、共产党员柴鶴仙同志，在旧社会所遭受的苦難，就是成千上万人力車工人苦難生活的縮影。

^① “洋車”即人力車。

难过“三关”

柴鹤仙，一九二一年出生于河北省河间县武家屋村，四岁死了爹。娘为了还债，卖掉了家里仅有的二亩薄地，一家人失去了生活的依靠，娘只得把姐姐送给人家当童养媳，领着四岁的柴鹤仙改嫁了。

柴鹤仙的继父家，生活也很困难。柴鹤仙在十一岁时，就给地主放牛，干的牛马活，吃的猪狗食，还得挨打受骂。一年到头，一个工钱也拿不到。到一九三八年春天，柴鹤仙十八岁了，他不甘心再给地主当牛做马。恰在这时，他听姐姐说，姐夫的表兄贾义轩在大连拉人力车，说大连的生活好混些。于是，柴鹤仙就决定通过姐夫的介绍，到大连投奔贾义轩。

柴鹤仙来到大连，向贾义轩说明来意。贾义轩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知道拉人力车是一件苦事。可是，在那个黑暗的旧社会里，穷人不管干什么活，都得受苦。他想来想去，只好同意了。

柴鹤仙这个乡下来的农民，对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统治下的城市生活还一无所知，对拉人力车的苦难更是没有尝过。贾义轩只好让柴鹤仙先给他“拥小把”，就是他在前面拉着人力车，让柴鹤仙跟在车后面拥着小把推。这对柴鹤仙，一方面，可以逐步熟悉大连市的街道线路；另一方面，可以练拉车的长跑；还可以学会如何对付那些日寇、特务、刑事、警

察的經驗和办法。

柴鶴仙跟在竇义軒后面捋了一个时期的小把，就打算自己独立拉車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大連，为了便于統治和剝削人力車工人，糾合一些車主資本家，成立了“人力車組合”，在“人力車組合”里面专门雇用了一批“內勤”和“外勤”人員，叫他們敲詐、勒索、打罵和管轄人力車工人。誰要想拉人力車，誰就逃不脫“人力車組合”这批吸血鬼的魔爪。

当时，在“人力車組合”里設的第一道关卡，就是报名。报名得送礼，否則，就別想报上名。柴鶴仙剛到大連不久，哪里懂得这个規矩。再說，他当时住在人力車大院，吃喝都靠竇义軒接济，哪来的錢送礼。他一連到“人力車組合”去报了两次名，都被那个阴阳怪气的“內勤”“挡駕”了。

柴鶴仙碰了两次釘子，就不想再低声下气地向这些走狗乞怜了。竇义軒和乡亲们为了让柴鶴仙拉上車，就主动給凑了几个錢，买了两斤点心、一斤茶叶，送給“內勤”，这才算过了报名这一关。

第二道关卡，就是学日語。在中国的城市大連拉人力車，还得学日語、說日本話，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当时，“人力車組合”規定：每学习一星期考試一次，考試及格的发給日語及格文凭；考不及格的还得繼續学。有一个姓李的狗腿子，专管教日語。柴鶴仙一連学了两个星期都沒有考及格，他有些納悶。后来，一个和他在一起

学日語的穷朋友告訴他：“你不給那个姓李的狗腿子送点礼，就是再学两个星期，也考不及格。”为了要找条活路，他又只得忍气吞声地借了錢，买了礼物，送給那个教日語的。到第三个星期就考及格了，領到了学日語的文凭。

第三道关卡，就是到伪“关东州厅警察署交通系”去考“車票”。监考的是一个名叫井山的日本人。这家伙大个子，两眼突出，一臉横肉。他看柴鶴仙去考試，就先发給柴鶴仙一块抹布，让柴鶴仙到他家里去擦玻璃、扫地、抹地板、刷便所。等柴鶴仙給他白干了好几天，才把柴鶴仙叫到他的办公室，进行考試。他問日本街名，要柴鶴仙回答中国街名；他問中国錢数，要柴鶴仙回答日本錢数。（当时，在大連同时流通中国貨幣和日本貨幣；同是一条街，有中国街名，又有日本街名，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統治的产物。）后来，他又用日本話說从哪里到哪里要多少錢，要柴鶴仙用中国話回答从哪里到哪里要多少錢。柴鶴仙一見到他那副嘴臉，早就憋着一肚子气，到了考試时，他也无心答对了。再說，柴鶴仙也沒有給井山送礼，井山就故意出难题刁难他。就这样，柴鶴仙一連去考了两次，都沒有考上。后来还是靠穷朋友帮忙，又借了三元錢，連同日語文凭一起托人交給和井山有联系的人，井山这才在日語文凭上盖了印，发給了拉人力車的“車票”。

考到了拉人力車的車票，还得向車老板租人力車。当时，大連共有两千多台人力車。大連“人力車組合”里的大

老板許傳彬，就有二百多台。租他的人力車，每台車每月得付足十六元租金，还得有两个連环保，保人要有人力車，或是老拉車的。如租車人到月不交足租金，就連同保人的車一起扣押。人力車如有損坏，租車人要負責賠償和修理。这样，車老板只要把人力車租出去了，哪怕你拉車的吃不上飯，也得先交租金。許傳彬，光靠出租二百多台人力車，每年就可以从拉車的工人身上榨取純利潤四万余元。当时，一台人力車只值一百五十元，一台人力車出租十个月，就可以买到一台新車，只从这个小数目字里，我們就可以看出人力車老板对人力車工人的殘酷剝削了。

柴鶴仙单租一辆車租不起，只好和别的工友合租一辆車，每人拉半天。

受尽“鬼子”汉奸的气

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統治下的大連市，拉人力車的工人，除了受“人力車組合”的剝削外，还得处处受日本鬼子和汉奸、警察的气。

柴鶴仙初拉人力車，租的車是后半天。在那个黑暗的旧社会里，夜晚出門坐車的，大都是日本鬼子、闊佬、刑事、狗腿子和那些吃喝嫖賭的流氓无賴。所以，柴鶴仙也就經常受到这些家伙的欺压。

一天夜晚，柴鶴仙拉着人力車在武昌街等了好久，也沒有拉到一个顧客。后来从日本妓院里走出个日本鬼子，他大

搖大擺地坐上車子就叫往大連市場拉。等拉到地方，他跳下車來就走，不但不給錢，還吓唬柴鶴仙說：“不要錢的走，要錢我就揍你！”柴鶴仙跑得氣喘吁吁，一個錢也沒得到，本想上前拦住他的去路，但一看他那凶神惡煞的樣子，只得忍氣吞聲，由着他走了。

又有一次，夜半已經過了十二點，柴鶴仙餓着肚子拉了大半夜的車，早已跑得筋疲力盡。他想把車送回“人力車組合”，好回去休息，正走到武昌街，一個日本鬼子走上前來，抬腿坐上車，就要柴鶴仙拉着往北走，也不告訴地址。柴鶴仙拉他跑了七八里路，過了勝利橋（當時叫日本橋），又問他上哪去？他仍不說明地址，還要柴鶴仙往北拉。柴鶴仙早已跑得又累又餓，心里又憋氣又窩火。又走了一節路，柴鶴仙又問：“到了沒有？”那個日本鬼子還是紋絲不動地坐在車子上說：“你的快快地走！”柴鶴仙一聽日本鬼子這盛氣凌人的腔調，早已憋着的一股怒火，再也壓抑不住，干脆把車停下來不拉了。這個日本鬼子下車分文不給，抬腿就走。柴鶴仙趕上前去，拦住他的去路，說：“坐車不給錢，往哪走？”這個日本鬼子舉起手來，打了柴鶴仙一耳光子。頓時逼得柴鶴仙新仇舊恨一齊涌上心頭，他再也不能忍耐了，順手就從人力車上拿起一塊一尺多長的活檔板，照着那日本鬼子頭上打去。打得那日本鬼子哎呀一聲，急忙彎下腰去脫下腳上的木屐，狠命地朝柴鶴仙打來。柴鶴仙往旁邊一閃，這一木屐沒有打着柴鶴仙，打在人力車的坐墊上，把坐



垫打了个大裂口。柴鹤仙又用档板向日本鬼子打去。这时已经是夜静更深，这个日本鬼子一看四外找不到警察、狗腿子为他撑腰，见形势不利，便撒腿跑了。这一次，柴鹤仙总算出了一口冤气。

人力车工人受警察、汉奸狗腿子的敲詐、勒索，也是经常

的事。

有一天，柴鹤仙拉着一个旅客上火车站，由于开车的时间快到了，这个旅客还没有等到车拉到停车场，就先跳下了人力车。柴鹤仙把车停在人行道的大铜钉旁，刚接过旅客付给的车钱，一个伪交通警察走过来就打了柴鹤仙一耳光子，又把他的“车票”没收了，说他违反了交通规则。柴鹤仙和他辩论，磨了半个多小时，他才开口说：“两条道由你选，一条是公事公办，你跟我到‘小衙门’（即日伪警察派出所）去一趟，再给你车票；一条是你我都留点情面，我开个条子，你把条子拿到泰和盛找老板盖个章拿回来，我就给

你車票。”柴鶴仙在心里一核計：公辦私辦，都得花錢。公辦了，這小子不能獨吞，以後還得找我的岔子，他想到這里，忍着怒氣說：“那就你我都留點情面吧！”

柴鶴仙接過偽警察交給的條子，趕到泰和盛，泰和盛的掌櫃接過條子一看，笑笑說：“這是‘宮先生’要你給他買三元錢的蘋果存在小號，你交三元錢，我給你在條子上蓋個印，拿回去就能取到‘車票’了。”柴鶴仙就這樣無緣無故地被那個姓宮的警察詐去了三元錢。

比敲詐勒索更殘酷的，就是那些警察狗腿子隨意對人力車工人的人身凌辱。

有一天，柴鶴仙拉着車從天津街“小衙門”門前經過。一個偽警察站在門前，閑得無聊，想拿人力車工人開心，就把柴鶴仙和另一個拉車的叫過去。那個偽警察站在一旁，硬逼着他們倆面對面地跪在那里互相打耳光。他們兩個都不肯用力打，那個偽警察就抬起穿馬靴的獸蹄踢他倆，直逼得他們倆互相打着耳光，把那個偽警察逗笑了，才算了事。

還有比這更殘酷的事情。在一個寒風呼嘯、滴水成冰的冬天，人力車大院的老人力車工人王兆鳳，拉着空車想去火車站拉生意。路過青泥洼橋，被偽警察劉成家截住了。叫到“小衙門”後院，不由分說，就打了一頓棒子。打完以後，這個狗腿子還不肯罷休，為了討好他的主子——日本鬼子警長的喜歡，又把王兆鳳的帽子摘下，領扣解開，腰帶解下，然後兜頭朝王兆鳳澆了一桶涼水。接着把王兆鳳推出“小衙

門”，逼着他站在頂風口上。刘成家自己却回到“小衙門”里，和他的主子日本鬼子圍着燒得紅通通的火爐，“欣賞”王兆凤那冻得索索战抖的样子。直等到那个日本鬼子看得哈哈大笑起来，这个狗汉奸刘成家才走出来，恬不知耻地学着日本鬼子的腔調对王兆凤說：“你的大大的热了的有？”然后，抬起他那穿着馬靴的兽蹄，照着王兆凤的身上踢了一脚，并罵道：“他媽的，滾！”

王兆凤身上的衣服都冻成了冰，四肢都冻麻木了。他經受了这一場折磨，回到家里，就索倒了。

难度的岁月

人力車工人除了要交高价的租金外，还得受“人力車組合”的层层剝削。当时的“人力車組合”有明文規定：每台人力車每月要繳納一次小捐，每个季度要繳納一次大捐，小捐四角，大捐一元八角。单身拉車的工人，住在“人力車組合”的大房子里。柴鶴仙住的大房子，是一个不到二十平方米的破板屋，上下两层板鋪，板鋪下面还住人，要挤四五十个人，人躺下了要翻身都困难。就这样，每个人每月还得拿两元錢房費，这又是一层剝削。

除此以外，伪“人力車組合”的那些“內勤”、“外勤”，还互相勾結，想出許多沒有名目的剝削工人的花招。他們常常借孩子生日、爹上寿等名目，和一年三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公开列名单，要人力車工人給湊“份

子”。如果誰不拿錢，他們就互相串連起來，在出車的時候找你岔子。光這一項，一個拉車的工人，每個月也得被他們剝削去三元五元。在層層剝削下，人力車工人在生活上受着苦難的煎熬。

柴鶴仙頭一年拉人力車，一個冬天都沒有穿上棉襖，為了驅寒取暖，每天一出門，拉着車就跑。車停在停車場里，拉不到客，他就在停車場四周跑着“量街”。

當時的大連，從火車站前到天津街一帶，多是住着日本鬼子和漢奸、刑事、狗腿子……到那裏拉車，少不了要挨打受氣，還常常白挨累掙不到錢。柴鶴仙為了少受日本鬼子和漢奸走狗的氣，就想多到西崗去拉生意（西崗多住中國人）。可是在那個時候，又能有幾個普通的中國人出門乘車呢？拉不到客，就得餓着肚子蹲馬路。有一年元宵節，天未黑，柴鶴仙就拉着人力車來到西崗市場前等着拉生意。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街上的人影慢慢地稀少了，燈光也有的熄滅了，柴鶴仙的人力車還是孤單單地停在那裏。已經是深夜十二點了，他只拉了一角五分錢，還不夠支付車老板一天的租金。在拉着空車往回走的路上，他早已餓了，他想吃點東西，從懷裏取出帶來的一塊苞米面餅子，已經凍的硬得象石頭，牙一咬上去，格格直響。就這樣，他度過了這個元宵之夜。

一九四一年，柴鶴仙二十一歲那年成了家。他的愛人劉桂香的爹爹劉天瑞，也是一個老人力車工人。

柴鶴仙和劉桂香結婚後，就搬出了人力車工人大院，在

王家屯租了間牆不擋風、棚不遮雨的破房子住下，算是安了家。有了家，吃的用的負擔都更重了。更可惡的是這兒的房主還有一項歧視貧苦住戶的規定：院里的廁所不准住戶的男人使用。柴鶴仙每天大小便，不管是刮風下雨，都得跑到一里路外的南山上去。

王家屯距離“人力車組合”大院有五六里。柴鶴仙每天出車、收車，都必須到“人力車組合”大院去辦交接手續。就是雨、雪的深夜，累得筋疲力盡，飢困交加，也要往返跋涉這十幾里路。

到了日本帝國主義者臨近垮台的前夕，柴鶴仙一家的生活更是陷入水深火熱之中，糠子面窩窩頭都吃不上。一九四三年秋，劉桂香懷了第一個孩子。她為了使柴鶴仙拉車能多吃點，在一天早晨，瞞過柴鶴仙，和幾個鄰居結伴乘火車到大房身去買了七斤苞米面，十幾斤地瓜，十幾斤蘿卜。往回走時，就聽人說，日本鬼子在車上搜查得十分厲害。搜出有帶糧食的，不僅糧食沒收，人還得挨打。劉桂香和鄰居們聽到信後，就不敢乘火車走大道，只好翻山越嶺抄小道走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才回到家裡。

到了一九四四年，柴鶴仙有了第一個孩子，靠他一個人拉人力車養活一家三口人，生活更加困難。而且這時日本鬼子還要抓人力車工人的勞工。逼得柴鶴仙沒有辦法，只得在小塢（修船廠）掛號當工人（日本帝國主義為了維持修船業的生產，加緊掠奪中國，對修船工人免抓勞工），白天上小

場干一天活，晚上回来还得拉人力車。就这样日夜拚命劳累，才勉强糊住了一家三口人的嘴，沒有餓死。

当了国家的主人

一九四五年“九三”胜利，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在旅大市上空飄起了紅旗，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再也不是奴隶，再也不用給帝国主义者做牛馬了。

解放后不久，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旅大市就实行了民主改革，把过去那些騎在工人脖子上，欺压剝削工人的汉奸、走狗，彻底清算。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都逐步得到了改善。手拉的人力車，全部取消，为崭新的脚蹬三輪車所代替。柴鶴仙的家也从四壁透风、房盖漏雨的破房子里，迁入三間窗明几净的紅磚瓦房里。

民主改革运动以后，党又指引三輪車工人走集体化的道路，成立了大連三輪車合作社，使三輪車工人的劳动和生活都有了保障。三輪車工人也参加了工会組織。柴鶴仙在党和工会組織的教育和帮助下，积极参加了各項运动，勤勤恳恳地工作，热心为旅客服务，逐步提高了階級觉悟。一九五九年，柴鶴仙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党組織三次送柴鶴仙到党校学习。从此以后，柴鶴仙更是处处用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拣重担子挑，时刻想到为人民做好事。

有一天夜里，柴鶴仙在大連火車站前三輪車合作社值

宿。后半夜两点钟，有个人民警察来敲门。原来，这天前半夜十一点，从码头轮船上下来了母子两个旅客，孩子还小，女人生病刚出院，带的东西又多，他们母子赶到火车站，在上楼买火车票时，那个妇女一不小心摔了一跤，就这样又病倒在候车室里。就在这时，两个人民警察到车站来巡查发现了。一个人民警察赶上前去搀扶着这个妇女，准备送她到医院去治疗。另一个人民警察就赶到三轮车社，想找辆三轮车把那个妇女送到医院里去。柴鹤仙听这个民警说明了来意，马上要亲自蹬三轮车送那个妇女去医院，但又考虑到三轮车社值宿的事。那个民警好象看透了柴鹤仙的心事，就说：“你放心吧！值宿的事由我负责！”柴鹤仙蹬着三轮车，在送那个妇女去医院的路上还在想：我们的社会真好啊！人民警察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好勤务员！旧社会里的警察敲詐人力車工人，刁难旅客的影子又浮现在他的眼前。新旧两个社会对比是多么鲜明啊！柴鹤仙把那个妇女送到医院，经过检查治疗，又把她拉回车站，送上火车。那个妇女要给柴鹤仙車費，柴鹤仙不收；那个妇女又要柴鹤仙给留个地址和姓名，柴鹤仙也没有留，只告诉那个妇女：“我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培养教育出来的三轮车工人，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快开车了，那个妇女还站在车窗前，向柴鹤仙挥手告别。

还有一次，柴鹤仙蹬着三轮车送一位旅客到码头去。这位旅客带的东西很多，要打一部分邮便，钱不够了，柴鹤仙

馬上從自己兜里拿出一元錢，代那位旅客支付了。那位旅客十分感激。

一个星期后，柴鶴仙接到了一封信，并邮来了一元錢。信上写道：

柴鶴仙同志：

你不愧为党和毛主席教育下的三輪車工人，你是人民的好勤务員。感謝你对我的帮助。今后我一定全心全意做好工作，向你学习。……

柴鶴仙接到来信后，馬上写了复信。他說：“在旧社会里，誰把咱穷拉車的当人看待。你来信提出向我学习，我觉得我进步得还慢，距离党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我們大家都應該听毛主席的話，向雷鋒同志学习。”

柴鶴仙現在是大連三輪車合作社的生产队长，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連續被評为旅大市先进生产者。

柴鶴仙的几个孩子，有的已經参加劳动，有的念中学，有的念小学，一家人生活得很好。柴鶴仙經常用自己过去的苦难經歷教育子女，讓他們听党的話，好好劳动，好好学习。按照柴鶴仙的話說，就是：“永远不能忘本，必須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啊！”

揮泪忆苦唱今歌

——哈尔滨民间艺术团二人转演员王寿臣的家史

柳连比 整理

哈尔滨民间艺术剧场，经常有一位年近半百的老演员登台演出，观众都赞美他的句头、辙口好，抢板夺字清楚、准确，嗓门高亢、透脆，舞蹈动作矫健、敏捷。他就是二人转著名演员王寿臣。

两块伤疤

王寿臣，今年四十九岁，他的腰部和腿部各有一块伤疤。说起这伤疤的来历，话就长了。

一九一七年，他出生在巴彦县太平岗的一个贫农家里。一家五口人，除了双亲以外，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父亲经常出去卖短工。王寿臣八岁便给地主放猪，后来他又跟着父亲出去卖零工。尽管他跟着父亲在地里拚命似地扑腾一天，也挣不到几个工钱。劳累一天，回到家里，就一头扎在炕上，胳膊腿全不听使唤了。

一九三三年春，王寿臣又到張老伯屯的地主“張三爷”的厨房打杂，想学点做飯的手艺。哪曾想，到了这家，不但手艺沒学成，还尽挨打受气。

有一次，“張三爷”办寿，王寿臣收拾飯桌的时候，因为桌腿不平，一栽歪，打了几个大碗和几个盘子。这件事很快傳到“張三爷”老婆子的耳朵里。晚間，她打发人把王寿臣从伙房叫到后屋。这个刁橫的老婆子，摆出一副恶狠狠的凶相，舌尖不露地先“哼”了一声，接着說：“这是好几辈子傳下来的宝碗，你說怎么办吧？”王寿臣只好回答說：

“我认賠。”老刁婆子忽地站起来：“你賠，你賠，你賠得起嗎？……”說着，就操起馬棒，象恶狼扑食似地劈头盖脸地向王寿臣打去。这时她姑娘媳妇也一齐动起手来，把瘦弱的王寿臣打得可地乱滾，神志有些不清了。他在昏迷中，听到一个女人奸詐地說：“裝死？让他起来滾！”王寿臣哪里起得来，她們連拉带拽地把他拖起来，推了出去。王寿臣一瘸一拐地剛要往外走，刁老婆子又狠狠地向他扔来一个火鏟，打在他的腿上，一块血紅的皮肉，离开了骨头，血淋淋地耷拉下来。

王寿臣忍着疼痛，走到伙房里往炕上躺下时，用手一摸，才知道腰背上还有一块伤。地主家象沒发生什么事似的，再也不管不問了，只有那些和他相依为命的伙計們照顾他。沒有錢治，王寿臣就用烟面子掺香灰敷在伤口上，煞得他滿头是汗，咬着嘴唇忍受着。后来伤口又化膿了，幸亏伙

計們弄到了一点药，敷在伤口上，过了二十多天，才算消了肿。伤刚见好，他想回家看看，可“張三爷”不答应，好说歹说，由大师傅担保，才准了两天假。王寿臣总算逃出了“閻王殿”。

过了几天，地主的外柜找上门来算账，算来算去，王寿臣干了九个月多的活，支了不到半年的工钱，还要叫他往回退钱。他妈妈愤怒地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这个外柜，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可是王寿臣上工时盖的那床小破被，却被地主扣下了。

另 謀 生 路

在旧社会，劳苦人哪有个闲身子，不给张家扛活，也得给李家卖工，王寿臣为了要活下去，第二年又到他二大爷家（富农）去扛活。挣的是半拉子钱，可干活得顶上个整人，凭他那把瘦骨头，一样披着星星走，戴着月亮回，鏟地一样抱壟，鋤草一天同样要鋤二百五十捆。他又累又困，常常在早晨吃饭的时候，就迷迷糊糊地躺在鍋台旁边睡着了。秋收打場，粮食入仓，他也得一样把口袋扛起来，经过两节跳板，把粮食倒进仓子里。有一次，王寿臣咬着牙强把袋子扛起来，刚上跳板，腿肚子就突突地抖起来，栽栽歪歪地走上了第二节跳板，脚象没根似的，一下子连人带口袋摔了下来。从那以后，他累伤力了。

一九三五年冬天，一个唱二人转的班子，来到村里。王

寿臣給他們做飯，很快就和他們混熟了。班子里的人對他說，過幾天要到金沟子去唱戲，那里掙錢多，能够養家糊口；又說王寿臣學這行挺合适。王寿臣的心被說活了，他眼看着全家缺吃少穿，在那數九寒天的日子裡，過門不到一年的老婆還要著單呢，他一狠心，背着父母，偷偷地跟這個班子走了。

學徒生活

王寿臣的身材單細，臉龐消瘦，再加上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師傅叫他學唱“上裝”（旦角）。

這個班子，有八九個人，除了唱二人轉，還能演拉場戲，在农村算得上是個大班子了。王寿臣一進班，班主就叫他找保人，立字據。字據上寫明，三年滿徒，學徒期間，不掙錢，病死傷亡，班主一概不管。

徒弟，實際上是班里打雜的。班子里的一切雜活，都由徒弟們包着。一旦有點疏忽差錯，屁股就得挨頓戒尺，有時被打得一連幾天不敢坐炕；再不就是跪磚頭，一跪就是一排“金定香”燒完，才算了事。王寿臣為了早一點學到本領，能够掙幾個錢養家，他勤學苦練，暗里留心。每天一早，他便悄悄地爬起來，到村外去練嗓子。為了適應冬天露天演唱，要在數九寒天里，訓練凍硬了嘴唇，以便唱起來靈活自如，咬文吐字清晰。夜間，他還要找個僻靜的地方練唱。過了一段時間，他學會了一些小唱和段子，偶爾也叫他出上台，墊墊

場。就是这样，也拿不到班里的一文錢。

王寿臣学徒不到两年，班主看他学得快，唱得好，就叫他頂角了。但頂角也不能掙整份子錢，只是凭班主的高兴，得几个彩錢。一直到三年滿徒以后才掙上整份子錢。班主既不参加外場的吹打彈拉，也不会里場的演演唱唱，他只靠几件乐器和衣装，在班里分錢。他一个人要分三个人的份儿；为了塞滿私囊，他还想尽許多办法来剝削艺人。他立下許多班規：不許艺人“犯快”，不許管拔毛戴甲的动物叫名称，要管黄皮子叫五爷，管刺猥叫二爷，管老鼠叫八爷……，不許丢单（节目单）拉鬚（假发，假胡須），誰要犯了規，都要罰款。有一次，輪到王寿臣报单，偏赶上把单子拉在住处，这是犯了班規，罰了一塊錢。当他唱完戏，又忘了要彩（賞）錢，又被罰了一元四角錢。这些罰款，都由班主掌管，名义上是买香上供，实际上，都进了班主的腰包。

每到一地，班主都要請客送礼，这些錢，都由艺人均摊，他說花了多少，就得給他多少。經過班主这样种种剝削，艺人們怎能养家糊口啊！

在 風 險 中 掙 扎

旧社会，二人轉艺人，沒有个长期落脚的地方，一年里也只有冬春两季的几个月，是他們主要的活动时间。在寒霜大雪，凄风冷雨里，他們穿着补釘落补釘的棉衣，背着开花的被子，四处奔波。碾房磨房里，馬圈草棚里，坍塌露天的

冷屋里，冰天雪地的院子里，是他們經常用的“劇場”。在“舞台”上唱下装（生角）的端着个蜡头，前后左右照应着，这就算是那个时候的聚光灯了。

在那黑暗的年月里，艺人們不但挨餓受冻，还經常受地主、警察的欺压、勒索。在王寿臣学戏头一年的旧历除夕，班子已經散了，可是双庙子警察所的警察，却把王寿臣和他的师傅等四个人，叫到所里去演唱。夜半更深，警察老爷們听够了，一个个提着灯笼出去接神，王寿臣他們餓着肚子呆呆地等待着他們賞錢。过了一会儿，警察所长回来了，見他們沒走，很不高兴，冷冷地說：“都接神了，你們怎么还不走？”师傅滿臉陪笑地說：“大过年的，我倒是小事儿，还有几个孩子呢，看着賞賞臉吧。”这位警察所长，气汹汹地从兜里掏出一把錢，往桌子上一摔說：“好啊，原来是等着要錢呀！要多少，拿去吧！”他把两手往后一背，在屋里重重地踱了几步，馬上又停下脚步說：“哼，你們唱完就該滾蛋，不抓你們还不是便宜事儿，还想要錢呢！”王寿臣他們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瞅着桌上的錢不敢拿，只得含着滿腹的冤恨走了出来。

王寿臣回到家里。在新春那几天，他参加了村里办的秧歌队。有一天，他們来到了高家窝棚，地主孙七爷把他們留下来唱唱。这事被四里以外的警察所长張大馬棒知道了，高家窝棚是張大馬棒的管轄区，因为秧歌队沒有先到所里去拜訪，就把他得罪了。張大馬棒带着警察找上来了，进门就喝

道：“誰把你們這些無業游民招來的，給我捆起來，送到所里去！”接着挨個打起來，因為王壽臣是唱上裝的，挨打也最多。

轉眼又到了第二年冬天，王壽臣和幾個藝人插班，他們躲避着那些“惡狗”眼睛，到邊家窩棚去唱唱。正在演唱的時候，突然從牆外跳進來一個警察，槍口對着他們說：“不許動，找繩子，把他們綁起來。”人們都楞住了。“還裝什麼糊塗，下坎丟了八口豬，都是你們這些小子干的。”說着就把藝人一個個都綁了起來，接着又是一頓糊塗打。班子里一個叫明月秋的上裝演員，頭上的珠子被打得粉碎，玻璃碴子扎了滿臉。這時，村子里有經驗的人，趕忙出面給警察打酒做菜，這家伙酒足飯飽以後，還得意洋洋地說：“讓他們躲，套上爬犁，把他們送到所里去唱。”王壽臣他們個個滿腹怒氣，但也只好收拾行李，連夜去趕唱。

“九香菊”出名以後

王壽臣經過一段藝術磨練，越唱越紅，師傅給起的藝名“九香菊”也漸漸地出了名。可是，這並沒有給他帶來什麼好結果，他的遭遇更加悲慘了。

一九三九年二月，王壽臣在一個姓駱的領的班子里，到高家窩棚演唱。一天晚上演出時，地主明國玉坐在前面。開頭，王壽臣請他點唱，他拒絕了，推托着叫別人點。他聲色不動地坐在那裡聽。王壽臣已經唱了好幾出，有些疲乏了。



这时候明国玉站起身来，不紧不慢地说：“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地乐一乐，我再点几出。”同行们都争着要替换替换王寿臣，明国玉摇摇头：“那可不行，我花钱点唱，就是要听‘九香菊’的，谁也不能替。”血气正盛的王寿臣，愤怒地

接着唱了下去，唱到十二出的时候，王寿臣已经支持不住了，他看了看班主，可是班主却说：“人家凭钱点唱，点谁谁唱，有钱还能买手指肉呢！谁要不唱就得扣份子，包赔损失。”王寿臣只好硬挺着唱下去。第十三出唱的是个大段子，戏又长，板又紧，只见他脸上的汗珠象豆粒似地滚动着。唱着，唱着，他觉得头也胀大了，眼前一片昏暗，接着吐了一地鲜血。同行们都同情地搀扶他，这时班主却说：“还是怪他短练，不会抻悠着唱！”地主明国玉以得意的神情，仰面哈哈大笑起来，“看你有多大脓水，有钱能买你的唱，也能买你的命！”听过这些话后，王寿臣的肺都要气炸

了，恨透了地主和班主。

一九四一年，他和几个艺人插班。有一次，在魏家窝棚演唱。这个地方有个土豪叫刘二秧子，为人十分凶恶，富人捧他，穷人不敢惹他。艺人们来到这个村，没有先去拜见他，就唱了起来。已经唱了两夜，刘二秧子还没朝面，人们有点纳闷。第三天晚上，他来了，气势有点不对头，唱了两出以后，他要点“茨山”、“上北楼”。满屋子老男少女的，怎么能唱这类粉戏呢？王寿臣陪着笑脸说：“这几出我都不会唱，请您换点一出吧。”刘二秧子眼皮向上一翻说：“你瞧不起人哪？老子有钱，叫你唱你就得唱。”王寿臣满肚子气愤，可又不能把话说得太强硬，他不软不硬地说：“谁家都有个姐和妹，二爷实在要听，就把妇女们请回去，不然就到您府上去唱。”这下子可把刘二秧子惹翻了：“好小子，不唱，还要这一套，谁把你们留下的，我家丢了两口肥猪，要你们赔！”他又对着四周的观众说：“谁要给他们起钱，我就叫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戏给搅黄了。艺人总还是要靠演出为生啊：为了能够继续唱下去，他们只好忍受着凌辱。第二天大伙摊钱买了猪肉、小鸡，请了一顿客，又给刘二秧子送去一个果匣子，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乞 討

艺人们就是这样饱经着数不尽的痛苦污辱，忍受着说不完的压榨欺凌，为了活下去，每到演出季节，到处挣扎、漂

泊。常常是今天在这个村子受辱，明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安身呢！

一九四一年冬季的一天晚上，王寿臣和几个同伴們，拖着疲倦的身子，好不容易来到三合堡，找到一个住处。刚刚合上眼睛，一个警察领着几个自卫队员，进来查夜，“你们为什么不报告？赶快滚出这个屯子去。”几次求情，也无济于事，要是再說下去，就会遭到一顿暴打，他们只好卷起行李走了。头上的天空黑洞洞，脚下的白雪嘎吱吱地作响，寒风象针尖似地直刺到他们的骨头里。他们深一脚浅一脚，毫无目标地往前走着。一夜里，他们摸索着走了二十八里路，到了夏家窝棚，天已经放亮了。个个全身披着一层白霜，浑身颤抖，饥饿逼迫着他们站在一家地主的门洞里，掏出竹板，唱起来……而他们得到的，只是人们吃过的残汤剩饭。

这是王寿臣仅有的一次乞讨吗？不，这只不过是他前前后后无数次乞讨中的一次集体乞讨罢了。

演唱，这并不是王寿臣的常年职业。每年的农忙季节，他不是回到家里帮助父亲种那一亩多薄地，就是随同父亲出外做工，更多的日子还是给地主扛活。每年新春的头几天，他要扮秧歌，跑旱船，挨门逐户去贺喜拜年，为的是能得到一些养家的费用。旧历除夕的前几天，他要经过无数的大门，去讨一些过年的干粮，或者是几个铜子儿。就这样勉强维持着家里的生活。

多少个年的旧历除夕，他只能和家人团聚短短的一会

儿。当有錢的人忙着悬灯結彩、鳴鞭放炮的时候，王寿臣却鎖着双眉、背着口袋、挎着条筐、打着竹板、唱着“喜”歌在挨門逐戶乞討着；他帶着一顆刀攪似的心，实指望那些財主們“慈悲慈悲”，让全家人多吃几頓飽飯，可是那些狠心的地主却攆着說：“大过年的，惹得狗咬吵吵，真丧气，快点走吧！”或者是把大門呸地一关，干脆不理。

黑夜尽头是黎明

一九三九年，王寿臣又遭到一个更大的不幸。这年“滿洲国”征他去当兵。他为了逃避这次兵灾，跟媽媽核計了半天，想出了一个瞞哄鬼子的办法。在檢查身体那天早晨，媽媽怀着难以忍受的心情，把辣椒面子揉进王寿臣的眼睛里，不大一会儿，眼皮四周起了一层白沫，眼睛紅肿起来，泪水不断地往下淌。他忍着疼痛等待着檢查。下午三点钟，輪到他了，一个穿馬靴的日本軍人走到他跟前，狠狠地踢了他一脚，罵了句：“八嘎，你的沒出息，开路开路吧！”当兵这关闖过了，眼睛却肿“封喉”了，眼边排滿了小米粒大的白泡，眼珠挂了一层白矇。过了一个多月，两眼才漸漸消了肿，两顆眼珠上却落下了白翳子，眼眶也凸出来了。从那以后，他再也不能唱上装了。

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地主勾通了伪官吏，抓王寿臣到虎林去当劳工。他在那又悶又热、蚊虫四起的草甸上打了几个月羊草。

一九四五年“九三”胜利，共产党来到了巴彦，王寿臣这才死路逢生，结束了苦难生活。他和所有的农民一样，分得了土地和馬匹。他本想弃艺从农，媽媽对他說：“你是学唱唱的，这玩艺多咱也不能扔，如今日子好过了，你更应该放心地唱。”一九四七年他到巴彦县的艺人訓練班学习，觉悟开始提高了，他参加了县里成立的二人轉組。一九五〇年，他代表全县艺人出席了松江省戏曲界首届代表會議，省里的首长給他們作报告，陪着他們一起吃飯，这是他作梦都沒想到的。他們参观了东北烈士紀念館，王寿臣看着那些威武不屈的烈士的遺容，引起了他的沉痛回忆。过去騎在人民头上的那些地主、恶霸、警察、班主的猙獰面孔，一个个浮現在他的眼前，他懂得了旧社会怎样把艺人变成了乞丐，新社会又怎样把乞丐变成了真正的人。文艺工作者，这个光荣的称号，是多么可貴呀！它凝結着多少烈士的鮮血啊！

一九五六年，王寿臣参加了国营哈尔滨民間曲艺团。一九五八年以后，他又担任了艺术組长。知苦才知甜，他把剧团看成是自己的家，成天在剧团里奔忙。从一九六一年以来，他連續被选为团、队的先进工作者。

为了不辜負党的培养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希望，他下定决心，深入工农兵，熟悉工农兵；唱革命歌，演革命戏。不断地加强思想改造，在文化革命中干到老学到老，为人民服务一辈子！

江湖流浪尽艰辛

吉林市豫剧团 康秀琴 口述

中共吉林市委“四史”编写小组 整理

我今年四十七岁了。每当我看到几个孩子蹦蹦跳跳地唱歌和专心学习的时候，就深深感到孩子们生在新社会的幸福。我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是孩子们做梦也想不到的。

三 次 被 卖

我刚记事的时候，家住在北京天桥附近。父亲是个木匠，母亲在我七岁那年就去世了。母亲在临咽气时对我说：

“孩子，我不是你的亲娘，你的亲娘在乡下。你父亲是给财主扛大活的，在你出生前就累死了。你母亲靠拣柴禾、卖零工度日子，生活没出路，就把你给了我……”从这，我才知道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爹娘。但是，我的亲生爹娘姓什么？他们住在哪里？我都一点不知道。

养母死后，只剩下养父和我。养父天天出去做工，就托房东“太太”照看我。一天，养父到远地做工去了，我正在

院子里玩，房东“太太”突然走来，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說：

“哟！看你孤单单的，多可怜，我带你去看戏去！”說罢，就把我拉进屋里，給我梳洗打扮。然后，就把我带到天津，卖给“西施紅”妓院的老板娘当“閨女”。从此，我就再也沒有見到我的养父。

卖到“西施紅”妓院不久，老板娘就給我裹了小脚，痛得我日夜不能安神，白天还得扶着墙給人家燒火做飯当奴隶。

第二年，这家妓院关闭了，老板娘嫁给一个伪軍官，把我也带去当丫头。后来他們又把我轉卖到天津另一家妓院。这家妓院老板娘四十多岁，滿臉橫肉。她每天晚上出去打牌，直到后半夜才回来，我得一直坐在門后等着开門，有时开門稍慢一点，就得挨打。这年冬天一个夜里，老板娘的儿子起来小解，我开門稍慢一点，他娘儿俩就一起下手把我按倒在地上毒打了一頓，还罰我跪在院子里，直折腾到第二天，还不让我吃飯。还有一次，她的儿子叫我去买燒餅，喊了两声我沒听见，他操起扫帚就往我臉上打，打得我滿臉流血。我的眼睛就是这次被他打斜的。当我把这件事告訴老板娘时，她还說：“打死也沒什么大不了的事！”那时，我有苦无处訴，只有暗地里哭。

后来，这家妓院又倒閉了，老板娘就把我送到一处公开贩卖人口的場所出卖。那里有很多被人拐卖的姑娘，并排靠墙坐着，象商品一样，头上标着身价。老板娘逼着我偏身坐

着，怕被买主看出我眼睛斜，卖不上价钱。我一到那里就大声哭喊，要老板娘送我回自己的家。老板娘却哄骗我说：“你不是愿意看戏吗？这里坐着的都是送去学戏的，你得听话，好好坐着，不然，还把你送到窑子里去！”我一听说学戏，就不哭了。果然这天来了个戏班子里的老头，花了二百块钱把我买走了。

那个老头把我领到一个住处，屋里放着很多戏装，果然是个唱戏的，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不一会，里屋走出一个中年妇女，她从头到脚看了我一番，就埋怨起老头来啦：“我一辈子就因为长得不好看，唱戏唱不开。你怎么又买来个斜眼睛的丫头哇！”老头急忙说：“买的时候，我没看出是斜楞眼，如果你看不中，就把她卖掉，再换个好的！”我一听卖掉二字，吓得浑身直哆嗦，只得哭着哀求说：“我已经三次被卖了，请行行好，收下我吧！”那个中年妇女详细地问了我的身世后，就把我留下了，做了我的第二个养母。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名字叫郝凤琴，是唱河北梆子的武旦。她原来也是个苦孩子，父亲是个修鞋的，母亲死得早，家中穷得无法活下去，在她五岁的时候，就把她送给了郝家。买我的当时，她已经三十多岁了，没儿没女，想买个女儿学唱戏，于是我就被她买来了。

江湖流浪尽艰辛

我十四岁开始唱戏，在旧社会度过了漫长的岁月，走过

吉林、辽宁和內蒙古的許多地方，也不知道搭了多少个戏班子，走了多少艰难路。經常住的是草棚子、破庙，吃的是稀粥、橡子面。那时候，戏班的头子象恶狼一样吸吮着艺人的血汗。他們有一套剝削艺人的規矩，如果訂一个月的演出合同，必須得演三十六天或四十二天，有的甚至还得演五十二天。說是五天一开支，实际上得干七天才开支。多干的天数不給錢，美其名是“帮財主”。

艺人們不仅受班主的盘剝，还得受官僚、地主、恶霸、地痞、警察、特务的欺侮。这帮混蛋专门爱串“戏下处”

（戏班子住处），圍着女演员轉来轉去。为了保住飯碗，我們是敢怒而不敢言的。

我十六岁那年，一家人流落到沈阳附近的新台子。养母郝凤琴和另外两个演員合伙組成了一个小戏班子。班底子，全是东挪西借的。可是，开戏之后，卖不出票去，借来的老本全赔进去了，戏班子散了，合伙的三个人都負了債。債主天天来逼債，我养母把她所有的衣物都卖掉了，也沒还清这笔債。没办法，就把我当成“抵押品”，她出去跑“梁外”（唱野台子戏），掙錢还債。我在債主家就象蹲監獄一样。最后，养母总算掙到了几个錢，才把我贖了出来。

我十八岁那年，又流落到內蒙的通遼鎮，在一家曲艺場里唱散段。曲艺場老板規定，每唱一段戏，必須从听众那里收六角錢。收不够自己补上。那时，曲艺場的听众是不买票的。我們演員唱完了一段，就拿起銅盘到听众那里去討要，

人家願意給点就給点，不願意給就拉倒。我一天唱六段，只能要上四段的錢。那兩段的錢就得自己補上，然后再和老板四六分成。如果按照实际掙来的錢分，我还能分一块四角多錢，这样一变花样，我就連一块錢也分不到。有时候，收不上來錢，几段戏白唱了，自己还得掏腰包。

当时，到曲艺場听唱的啥人都有，我們啥气都得受。有个公司的經理，外号叫赵扒皮，他到曲艺場听过两回戏，就要娶我做小老婆，逼得我不得不离开通辽，逃到长春。在长春，找到养母之后，就到德惠县搭了另一个戏班子。这是个四十二天的班子，演四十二天戏，掙三十天的錢。

到德惠不久，伪县政府殷股长在我身上打起鬼主意来，硬要娶我做小老婆。这家伙五十多岁，滿臉橫肉，搶男霸女，无惡不作。我急得天天哭，在这同时，通辽的赵扒皮又找上門来。这时，有个朋友給我們出了个主意，让家里給我趁早找个主，好把禍事搪过去。就这样，我同打鼓的康庆善訂了婚。我和康庆善訂婚的事很快傳到赵扒皮和殷股长的耳朵里，他們怒火万丈，說一定要找康庆善算賬，非把他打出街杀掉不可。康庆善听到这个消息后，連夜逃到三岔河，随后我們全家赶到，在那里，我与康庆善結了婚。从此，我这多年沒有姓的人，才随了康庆善的姓，起了現在这个名字。在这之后，我們就离开了原来的戏班子，迁到吉林。

在吉林，我們搭了很多个戏班子。然而，不論是哪个戏班子，班主都一样狠毒。記得我們在張广財的班子里唱戏

时，每天都是从东关跑到西关，唱两场戏，可是他只给我们两碗稀粥喝。我们饿得难受，要求他往粥里放点黄豆。他却说：“黄豆是喂猪的，猪吃了多长肉，给你们吃了有什么用？”我们只得饿着肚子去唱戏。

后来，我们又搭了一个戏班子，班主姓徐。他经常领着戏班子跑“梁外”，一遇到刮风、下雨、大雪天，不能唱戏，挣不着钱，就得凑合着蹲小店。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九四〇年农历十月，我在敦化生二女儿慧珍时的情形。临产前，他们还逼着我唱了两场戏。产后，我和别人住在一间大屋里，屋里四面透风，炉子也不好烧，一烧火就得敞着门，结果我得了产后风。没钱治，找班主借，他不肯借。孩子饿得直哭，急得我病越来越重。后来幸亏找到一位中医，他答应先看病后给钱，我们母女俩才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

我的病刚好，班主就逼着我去唱戏。不久，他们又把戏班子拉到长春。孩子小，没人照看，唱戏时还得把孩子抱到后台，上场就交给别的同伴看管。就在这个时候，庆善和他的弟弟（原在长春）又得了伤寒病。我又要唱戏，又要照顾两个病人，又要看孩子，实在忙不过来，向班主请了两天假。这家伙就把我解雇了。

苦日子熬了几个月，庆善的病好了。这时，已经是旧历十一月。听说铁北宋家洼子有个姓赵的地主要成班，我们就奔他去了。我们一去，就给开了十天的工钱，可是以后就再也不给开了。我们一问，他就说，过年就开支。过了年之后，

他又說過了十五就开支。可是，十五一过，他就解散了戏班子。我們白白地給他唱了两个月戏。这个时候，我們手里一文錢也沒有了。只好求亲靠友，借了几个錢回到吉林。

撥开烏云見青天

一九四八年三月九日吉林解放了，共产党、毛主席把我們这些受尽苦难的艺人从地獄里救出来。一九五二年組織上送我进医院把过去被人打斜了的眼睛治好了，現在我在豫剧团担任化妆工作，党組織非常关心我的进步，领导同志还經常到我家問寒問暖。

我們一家八口人，庆善在京剧团乐队工作，他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的五个孩子在党的撫育下，象小苗一样茁壮地成长起来。大女儿慧兰，現在是吉林市豫剧团青年演員，二女儿慧珍，在省戏校工作。其他三个孩子都分別上了小学、初中、高中。如今这种幸福生活，过去做梦也是想象不到呀！

每当假日，我們全家欢聚的时候，我都要向孩子們讲訴旧社会艺人的辛酸，告訴他們要时时刻刻听党的話，努力学习，好好工作，永远跟着党走。

我常想，我的一生虽然沒見亲娘一面，但是我却找到了比亲娘还亲的人，这就是党。

一个女售票员的遭遇

沈阳市电车公司电车司机 景淑珍 口述

沈阳市电车公司“厂史编写小组” 整理

在旧社会，我们汽车、电车售票员，被统治阶级叫做“臭卖票的”。那时，售票员所受的苦难是很深的，女售票员的苦难更是说不尽啊！

求活路难上难

我出生刚四个月，父亲就死了。父亲死后，妈妈带着我和两个姐姐过日子，孤儿寡母的日子可真不好过。生活没出路，我们只好离开家乡——铁岭县晓明村，搬到娘娘庙村舅舅家。后来，舅舅也死了，日子更过不下去了。我的两个姐姐先后出了嫁，二姐嫁给沈阳（当时叫“奉天”）一个修汽车的工人。在一九四四年的秋天，我十四岁那年，妈妈抱着“到大地方，还许有个活路”的幻想，领我投奔沈阳二姐家。

到二姐家一看，他们生活也很苦。虽然二姐夫在当时的

“奉天交通株式会社”当汽車修理工，二姐給人家做零活，可是每月掙几个錢，一家人連橡子面都吃不飽。我們沒有別的依靠，只好住下，和二姐家一起穷对付。我整天出去拣煤核，媽媽攬針綫活做，这样，又熬了两年多。

日本鬼子投降后，又来了国民党反动派，穷人的日子照样不好过。国民党反动派发的流通券，天天毛，我們母女俩掙的几个汗水錢，还不够糊嘴的。二姐家的日子也越过越累。一九四六年，我十六岁那年，听说当时的沈阳汽車管理处招考卖票的，我媽心活了，就对二姐說：“淑珍也不小了，让她去考考試試，万一能考上，也能带出个嘴去。”二姐夫皺着眉头說：“唉，这年头找事得送礼啊！”核計了半天，二姐找出几件衣服变卖了，买了三百个鸡蛋，姐夫領着我到汽車管理处管人事的何課长家去送礼。何課长斜楞着眼看了看筐里的鸡蛋，迟迟疑疑地說：“現在报考的人太多呀，你們来晚了点……不过，我尽力而为，你們过两天再来打听打听吧。”我一听，心里很着急。我們出来后，二姐夫气憤地說：“什么来早来晚的，还不是嫌咱送的礼物少。”为了送礼，全家都犯了愁，哪有錢再买东西啊！后来没办法，二姐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折騰了，又买了些东西送到何家。何課长一看，馬上換了一副嘴臉，笑着对二姐夫說：“咱們都是老同事，应该照顾点！叫她二十五号去考吧，沒問題。”

考試那天，我心里一点底也沒有，我还是小时候念了几

天书，只会写个名，能考个啥！这时监考的来到我跟前，低声說：“你叫景淑珍嗎？”我說：“是。”她就遞給我一張写滿了字的卷紙，低声說：“你在背面写上名就行了。”我拿起卷紙，也沒看上边写的什么，就在背面把名字写上了。我沒有“考場經驗”，不象人家即使接到这样的卷子，也不馬上交，坐在那里装相。我写上名，就交了卷，象做大梦似地出了考場。

发榜的那天，看到榜上有我的名字，还是正取，我心里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是，为什么有正取还有备取？我不明白。回家就問二姐夫。二姐夫戳穿了这个秘密說：“送礼多的是正取，送礼少的就是备取唄！”我又問：“那么，备取的能不能要呢？”“那就看再送不送礼了。”

“考”上以后，还有一道难关，就是“打保”。按規定，得找一家“殷实鋪保”。二姐夫拿着“保条”跑了几家媽媽和二姐常給做針綫活的买卖家，說了不少好話，都沒給打。最后，到比較熟識的“新新豆腐房”，还是沒打来。二姐夫咬咬牙說：“还是得拿錢来买啊！”他又用一家人糊口的飯伙錢，买了一双小皮鞋，送給豆腐房掌柜的小孩，才把保打来。

入 苦 海 受 折 磨

第一天去上班，二姐把我送到門口，囑咐說：“妹妹，这回可好了，好好干啊！”哪知道，从此我就掉进了苦

海。

沒正式上車賣票之前，先到教育股受訓。教我們對待什麼人，用什麼方法賣票；並規定上班不得帶錢，賣票不許錯款，錯了，按舞弊論處，不但開除，還要罰款。從打一進管理處，左一個開除，右一個罰款的規定，象千條繩索，勒得我吐不出氣來。

每天上班，領完票，背上皮兜子，由一輛專用的車，把我們拉到交接班地點——偽市政府車站；下班，再用這輛車照樣拉回來。然後，我們去交款。交完款，就登上一個木頭的檢查台，渾身上下被搜個遍。這是平時的例行檢查；要是遇到大檢查，就只讓穿個背心和褲衩。沒有差錯還好，要是有個一差二錯，挨打、罰款、開除等處罰都來了。記得有個姓劉的賣票的，交款時少了兩張票錢，當場就被帶到檢查室脫了衣服，從頭髮直搜到腳趾縫。雖然什麼也沒搜出來，也照例先打一頓，然後開除了。所以，我們交款時，都提心吊膽，上檢查台，心中怦怦直跳。

住在宿舍里，不到星期天，不准出大門，二門外是管理處辦公室，當時，都怕抓去“換兜子”，所以，我們根本不敢出二門。“換兜子”，是管理處的“官”們出的損招。他們為了防備“舞弊”，隨時抓個閑班的賣票的，坐上小汽車就到中途堵車，換下來在班的賣票的算賬，起個名叫“換兜子”。誰也不願意被抓去“換兜子”。有一回，我沒躲開，被一個姓張的“處長”拽上小汽車，到中途堵車。這家伙象

只餓狼似的，盯着越來越近的汽車，等車開近時，一舉手把車擋住，凶橫橫地推開車門，跳上去，叫姓陳的賣票的下來。她說：“我剛收了兩張票錢，車票還沒給人家呢！”這家伙根本不理，就拽着她算賬去了。我替她上車走了，一個勁地替她擔心。回來一打听，果然出事了。就是因為她收了錢，還沒來得及給票，就被叫下來，所以兜里多了兩張票錢。那個“處長”不問青紅皂白，硬說她是“舞弊”，帶回來打了一頓，罰了錢，就把她開除了。

為了這個事，我好幾天都覺得心里堵得慌。這叫什麼世道！我們干這行的，在那些當“官”的眼里，就象“賊”一樣。其實要說賊，他們就是不折不扣的賊。他們的所謂防備“舞弊”，實際是賊喊捉“賊”。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時期，物價一天數漲，甚至我們每月掙的連幾斤苞米也買不到的餉錢，他們也沒有放過，我們把錢放在宿舍，他們就說這有“舞弊”嫌疑，闖進宿舍把錢搜走，還起個名叫“統一保管”。可是，保管來，保管去，都叫他們給盤剝個精光。

我們在車上賣票，什麼倒霉事都能攤上。匪官兵、偽警察、狗特務、流氓惡棍，高興了，耍一頓流氓買張票；不高興了，輕的要無賴，張嘴就罵，重的抬手就打。有一回，我在府東綫（大東門至偽市政府）車上賣票，在大東門站，上來一個憲兵。他見我靠着車欄杆站着，就裝出喝醉的樣子，晃晃蕩蕩地往我身上靠，我讓他往里走，他不但不走，反而舉手打我一個嘴巴，還罵道：“臭賣票的，有什麼了不起

的！”司机停住車来劝解，也挨了个嘴巴。到了伪市政府終点站，我一肚子委屈再也憋不住了，就哭起来。这时，潘“股长”不知从哪钻出来：“哭什么，嬌性的，怕挨打就别干！”他又鼻子不是鼻子、臉不是臉地說：“快上車卖票去！”我真有心扔下皮兜子不干了，可又一想，不干这个又干啥去？只好眼泪往肚里咽，抽抽噎噎地上了車。

那年头，卖票的无故挨打，是家常便飯；卖票挨打，收票挨打；上不来車打卖票的，車里发生什么事，也打卖票的。有一回，我在府北綫（伪市政府至北陵）的車上卖票，晚上收車这趟，在維德街車站没人下，就通过了。有三个国民党兵沒赶上这趟車。他們第二天就在北陵等着，揚言要打我。这事叫另一个車卖票的李姐听见了，在中途站她告訴我，并和我换了車，才躲过去这頓打。

还有一次，在府南綫（伪市政府至南八条）上，經過伪“警备司令部”时，車被几个“糾察”拦住了，要檢查。車里滿載国民党伤兵，他們誰也不下去。“糾察”就对我瞪眼說：“臭卖票的，讓他們都下来！”我知道这帮殘兵败将不好惹；但是，不叫吧，“糾察队”那帮恶狼更惹不起。没有办法，我只得强装笑臉喊：“各位官长，請下来接受檢查吧！”伤兵一听起了哄，有的喊：“把她推下去！”冷不防，我被仰面朝天地从車上推下来。剛站起来，“糾察”們又打我一个嘴巴，还吼叫：“快讓他們下来！”逼得我真不知怎么好了。上車叫吧，伤兵打；不叫吧，“糾察队”又不

饒，无奈，还是硬着头皮去劝伤兵下車。这些蛮不讲理的家伙，举起拐杖就奔我打来，我撒腿就跑，“糾察队”看沒法收場，也溜了。

在車上，挨打受罵，熬到下班，含着眼泪走进飯厅，吃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总也不換样的紅高粱米粥，豆餅湯，整天餓得肚子响，心发慌。这样，天长日久，由于缺乏营养，大家都得了“雀蒙眼”，天不黑就得上床，要不就摸不着床位。晚上起夜，一个領一个瞎摸，睜着眼看不见，那滋味可太痛苦了。那些“官”們根本不管，后来，我母亲东打听西探問，討了个偏方，吃了才好一些。直到解放后，才彻底治好。

宿舍里，夏天，阴湿、悶热；冬天，門窗玻璃坏了不給嵌，冷风和雪花呼呼往里灌，又不給生炉子，真象住在冰窖里一样。沒办法，只好用破包袱皮，把門窗挡一挡。我們的被褥又都很薄，晚上冻得实在睡不着，只好几个人挤在一个被窝里，还暖和点。早晨起来，洗臉盆里的水已冻成冰坨，只好用手把冰捂化，往臉上捋两把，就算洗臉了。

那时，我們連結婚的自由也沒有，結了婚，就得被开除。有个王姐，是我們女卖票的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因为怕开除，一直不敢結婚。后来，年龄实在大了，家里老人逼，男方催得紧，无奈，才偷偷地結了婚。婚后又不敢回家住，怕“漏宿”，开除。那时查宿很紧，每天夜里，“舍监”都挨屋查鋪，哪个鋪缺人，就不行。我們大家为了让她隔两三

个星期能回家住一宿，就冒着开除的危險，給她“冒名頂替”。“舍監”查宿，每次都是从一舍开始，当他查完一舍，我們趁他进二舍的时候，抽空跑到三舍，钻进王姐的空被窩里，把头一蒙，混过查宿。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反动派快垮台了，汽車管理处的大头头忙着逃命；小喽囉心惊胆战，又加上汽油中断，出不了車啦。伪汽車管理处倒閉后，開車的和男卖票員都被解雇，只有我們十几个女卖票員被“轉到”电車厂。

当时，为什么只留我們十几个女的呢？因为电車乘客大部分是国民党兵，男卖票的卖国民党兵的票收不到錢。当“官”的看到收入下降，就把我們要到电車厂去，他們表面上說是照顾我們的生活，其实是拿我們当“搖錢树”。

离火海进刀山

到了电車厂，一个名叫高良群的“营业課长”神气活現地對我們說：“厂里對你們最大的期望，是在卖‘軍人’票上面多出点力。你們都是年輕人，要打扮得漂亮些，卖票时，要先笑后說話，給人一种好感。”他还摆出一副奴顏婢膝的样子表演了几次，叫我們学。那副丑相，真叫人恶心。这是拿我們女卖票的当招牌，好狠毒的手段！

就这样，我們女卖票的，大部分被分配到南站、北市場、十間房（遂川街）等国民党兵較多的車站去卖票。每天卖票还有“定額”，卖不够数，不让下班，多咱卖够了定額，

多咱回来。我們成半宿地在站上“立卖”，腿都站肿了。

卖国民党兵的票是最令人头痛的事，一說讓他們买票，他們就張口大罵：“他媽的，老子坐飞机、坦克都不花錢，坐个破电車还要錢！”有一回，在北市場車站，上来了三个国民党軍官，我向其中一个女的說：“官长，請你买張票吧！……”好話不知說了多少，那女的才递給我一張五角的“金圓券”，等我把票交給了她，她馬上又想到我手里搶那五角錢，我不給她，她竟打我一个嘴巴。我真气火了，心想：“我就不怕你，偏不給你錢。”于是我一手攥紧錢，另一手重重地回了她一个嘴巴。这一下子可惹了禍，那两个男的也都上来打我，我也拚命和他們撕打。打到伪市政府車站，他們三个人把我从車上拽下来，按在地下，連打帶踢。那个女的还薅掉我一大綹头发，血順着耳边往下流，我支持不住了。在众人的劝解下，他們才揚长而去。我被搀回車务股，手里还紧紧地攥着那五角錢。高良群見錢眼开，乐顛顛地对其他卖票的說：“景淑珍做的对！別管打成什么样，錢还是沒撒手。”听了这話，我的肺都气炸了：“这帮毒蛇，就認識錢，不管別人的死活。下回我再不干这样的傻事了！”以后，我也学乖了，慢慢摸清了国民党兵、特务和伪警察的脾气：“搖頭是免票，瞪眼是护照”。只要他們搖搖頭，瞪瞪眼，我就不再理这帮家伙。

这些貪官污吏，不仅讓我們挨打受罵給他們掙錢，还在伙食上刮我們的油。他們想了一条刮油的“妙計”，讓我們

女卖票的也到他們的小廚房吃飯，說是“优待”，其实，他們吃的是大米白面、鸡鴨魚肉；我們整天喝一个粒跟一个粒跑的小米粥，可是飯錢却和他們一样多。因此，每月开的餉，还不够飯錢。一到开餉的时候，只領个空餉兜，上面写着紅字——倒欠了厂方的錢。我們不願意到小廚房吃飯，他們就說我們不識抬举，这真是損人透頂的“优待”！

一九四八年秋，国民党反动派末日当头，粮价飞漲，錢更不頂用了。“单身”都强活着，拉家带口的，可就更慘了。有个老扫車工曲登道，家里人口多，开一个月餉，买不了几斤高粱米，后来活活餓死。大家都为此悲憤得流泪。

人怕逼呀！逼到沒有活路时，也就豁出来了。有一天，下了早班，已經是下午四点多钟了，廚房的烟囪还没有冒烟，說是沒米了。大家餓得聚在廚房門外，吵吵嚷嚷。这时，管总务的課长名叫何雨田，外号叫何雷子，大搖大摆地走过来。一見廚房門口圍着不少人，他怕惹麻煩，就繞道走了。不知誰喊了一声：“何雷子要溜，不能让他走！”哄的一声，大家攆过去，把他圍住：“为什么干完活不給飯吃！”七言八語地质問他。何雷子板着臉說：“吃飯的事我不管，你們找伙食长去！”“沒有米得和你說！”一个檢修工人气憤地說。何雷子賊溜溜地看了一下手表：“我現在下班了，明天再說吧。”“你下班了，我們还没吃飯呢，想餓死我們嗎？”“他不讲理，揍他！”“打！打！”大家都喊起来。你一拳，我一脚，打得他东倒西歪。他边挨打，边往

后退，退到墙角，嘶哑地告饒：“兄弟是非常同情諸位的疾苦的，不过兄弟实在是无能为力呀！”大家又哄起来：“不行！别听他那一套！打！”他看实在不行了，就向躲在一旁的那个姓罗的伙食长說：“你快买米去呀！”这天晚上八点多钟，大家终于吃到了一頓小米飯。

党的恩情記心間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沈阳解放了。盼星星盼月亮，可把这一天盼来了。从这天起，我們的好日子就开了头。

十一月三日这天，我們拿着鮮花，欢迎共产党派到我們电車厂来的干部。我当时个儿不高，捧着一把鮮花，在人群里，拚命地往前挤。多少年来，可看到亲人啦！我們不再是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了！

解放后，我們不再是“臭卖票”的，而是光荣的人民車务員了。虽然还是背着皮兜子在电車上卖票，可是，情况却完全不同了。我們得到了党和人民的最大信任，罪恶的搜身制一去不复返了。我們还受到人民的尊重。有一次，車上上来一位人民解放軍，我一时沒有变过嘴来，叫了一声“官长”。这位解放軍臉一紅，和顏悅色地說：“不要这样叫，咱們都是同志！”同志，这是多么亲热的称呼！我不禁激动得落下泪来。真是两种社会，两种人啊！

一九五一年七月，党又培养我当了人民的电車司机。这是我做梦也沒想到的事情。我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对着鏡

子說：“景淑珍啊，景淑珍，要不是共產黨和毛主席，你這個臭賣票的，將要落到什麼地步呢？”

日子過得舒心，就感覺時間過得特別快，轉眼我開車都十四年了。十四年里，我盡自己的力量駕駛車輛，保證了安全行車。我總覺得自己對國家的貢獻太小了，尤其是在學習毛主席著作以後，更感到自己做的離黨的要求差得太遠了。我暗暗下定決心，學習白求恩、張思德和雷鋒的革命精神，運用到我的工作中去，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有一回，我開有軌二路（大東門至沈陽站前）車，上來一位女乘客，肚子痛得很厲害。正好，有位閑班的司機在車上，而我到大西門就要換班了。我就托他把車開走，我攙着那位女同志到附近的醫院看完病，取了藥，又把她攙回家。

還有一回，我開有軌一路（大東門到鐵西區十四路）車，開到南一馬路，發現前面的車壞了。乘客非常着急，如果不想辦法把這輛車開走，後邊的車就要堆上了。我就跑到那個車上，一看，是空氣電機壞了，司機又是個新手，怕出危險不敢開。我想：毛主席不是教導我們要學習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嗎？現在別人有困難，我就應該見困難就上。於是我就和那位司機換了車。

想起在舊社會賣票時的生活遭遇，再看看今天售票員的社會地位，這是多大的變化呀！不忘過去苦，方知今日甜，我要更好地聽毛主席的話，永遠做個人民的忠實勤務員。

厨 师 今 昔

长春飯店厨师 康勛培 口述

长城宣 整理

我是长春飯店的厨师，今年四十六岁，干这行整整二十八个年头了。在旧社会，干我們这一行的，被人看不起；現在我們成了国家的主人，心里总是乐滋滋的，干起活来浑身是勁。看看現在，想想过去，我就越是忘不了过去那些受苦的事儿。

我的老家在山东省招远县康家村。全家八口人，只有三亩薄地，一年忙活到头，打下来的粮食还不够三个月吃的。生活逼得爹和我們哥几个只得去給地主扛活，但仍然吃不飽、穿不暖。在我十七岁那年，家乡又遭了旱灾，为了找个活路，爹就托亲友，在“新京”（长春）中央飯店給我找了个学徒的地方。

这个飯店的老板刘綬斋，是当时飲食业中的一条毒蛇。他在“新京”共有五处买卖，宴宾楼、五香居、公記飯館等都是他开的。他倚仗日寇、汉奸势力，专门剝削和压榨咱們

工人，为官僚政客服务。

进这个饭店学徒的条件很苛刻。学徒的铺保中规定：“学徒三年内不挣工钱，不到三年离店者，要补偿饭费。”当时，我哪里还能管什么条件苛刻不苛刻，只要有个地方住，能有碗饭吃就行了。

我到了饭店以后，名义是学徒，其实并没有人教手艺，每天早晨五、六点钟起身，夜里十一、二点才睡觉，成大给掌柜的端洗脸水，洗衣服，到厨房掏炉灰，生炉灶，扒葱、剥蒜、撸鸡毛，什么活都得干。一天干十五、六个小时，才劈一厘（一份的十分之一）“小柜”。就这样，还净受窝囊气，常常平白无故地挨鬼子、汉奸和工头们的打骂。我们后堂有个灶头掌柜的，这家伙，大个儿，长得又黑又胖，好打人，大伙都叫他“徐黑手”。他平时背个手蹦蹦跳跳，不到活忙时不上灶。他一上灶，我们十几个小年青的（学徒工）就倒霉了。他一不顺心，不管遇到谁，操起家什就打。有一次，我刚点好炉灶，他凑近炉灶一看，立即气势汹汹地喊道：“你来瞧瞧！”正当我哈腰看灶坑时，他顺手抡起一根二尺多长的铁棍，一下子就把我打倒在地上。我心里恨透了他，但只能躲在一边生闷气。在那个社会里，穷人有苦又能向谁诉呢？

到这个饭店里来吃饭的鬼子、汉奸、特务们，更是横行霸道，没事也要找岔儿。我们这些“跑堂的”没有一个不挨打的。有一次，一个鬼子喝得醉熏熏的，腰上挎一把大马



刀，在店里橫冲直闖，伙計們都东躲西藏，避开鬼子。我沒有来得及躲避，这个鬼子举起火馬刀就照我的胳膊上砍来，要不是我閃得快，左胳膊就被砍掉了。

送外卖也和店里一样挨打受气。有一次，我拿提盒子去給一个特务送午飯。他无事生非地說飯菜不对，抬腿就給我一脚，还没等我站稳，又一伸手狠狠地給我一巴掌，我被打倒了，头磕在門框上，肿起了一个大包。回到店里，掌柜的知道了这件事，还把我叫去，罵了一頓。

我們当学徒的，沒有工錢，全仗劈点“小柜”。但是，就是这点少得可怜的“小柜”，老板也要从中榨取油水。从經理到掌柜的，大大小小的資本家的代理人，除了拿工資和分紅以外，还十厘八厘地劈“小柜”，名为“身份股”；后

堂供的“胡三太爷”，也要劈十厘“小柜”，名为“财神股”；賬房先生經管“小柜”，也要私吞一些，剩下給工人劈的就沒有几个錢啦。可是就这样，他們还逼着工人一年三节給資本家和資本家代理人送礼，逼得工人苦上加苦。

这家飯店老板刘綬斋还认为：有家的工人容易誤工，耽誤他的买卖，因此，規定凡是吃劳金的工人，都不准帶家，誰帶家就开除。有一年五月节，刘义同老师傅的老伴領着两个孩子从关里来找他，原指望夫妻能够团聚，哪曾想这事被老板知道了，二话沒說，就把他解雇了。夫妻俩含泪被撵出了飯店。

就在刘义同老师傅被开除的第二年春天，我家里也来人催我成家。这事真使我左右为难，不結婚吧，亲事早已訂下，妻子来了无处安身。結婚吧，又怕飯店老板知道了，打了飯碗。最后，在伙友們的帮助下，偷偷在城西郊找了間破房子，成了亲。

那房子又窄又小，剛能轉开身；站起来头頂房梁。房后紧靠铁道，周圍全是荒草甸子。婚后，我不敢常回家，怕露了馬脚。妻子一个人在家里担惊受怕，也沒有法子。过了半年，她怀孕了，眼看冬天就要到来，再呆在这个破房子里，也挨不过寒冷的冬天。她只得含着泪回山东老家去了。

这家飯店老板对待有病的和年老的工人更是狠毒。刘喜春在飯店里当了十几年跑堂的，到五十岁那年，老板让他到二楼看茶炉。每天十七个房間飯客用过的酒壶，都由他里外

擦洗干净；一千多个饭客的饮水，都由他供应；喝酒由他烫，用过的酒壶，由他到各房间去收。烧开水，还得由楼下往楼上端煤，从楼上往楼下送炉灰……。十几年的跑堂生活，已经把他折腾得得了肿腿病，干活、走路都很困难。可是，要活下去，不干又怎么办呢？有一天，他往楼下挑炉灰，下楼梯时，腿一抽筋，身子一趔趄，连人带土篮一起滚下楼去。为了保住饭碗，老人只好咬着牙继续楼上楼下地忙活。伙计们看见了，都很同情他，偷着帮他干些活。这事叫老板知道了，找到刘喜春就说：“你这么大年纪，也该歇着了，明天你就离开这里吧！”这个被资本家吸干了血汗的刘喜春老人，就因为不能再继续为资本家卖命，被赶出了饭店。

那时老板只管自己发财，哪管工人死活。我们工人当时都住在饭店的地下室里。里面积了一尺多深的水，我们几十个工人就在水上面搭个大床铺睡觉。每天干完活后，得用木板搭个桥，才能走到床铺上。人站在板铺上抬不起头来，倒下也只能肩膀挨肩膀地侧身躺着，连翻身的地方都没有。冬天冷，夏天潮，床上到处是跳蚤、臭虫。这样恶劣的生活条件，再加上成年累月的劳累，我得了伤寒病，可是老板根本不管。多亏伙计们热心侍候，我才没有死。

我的伤寒病刚好，老板又让我去当劳工。我们到了当劳工的地方——二道沟日本侵略军十九部队仓库以后，睡在漏雨的板房里，吃的是半生不熟的窝窝头。一天到晚尽干些东搬西扛的活。不多日子，就把我们折腾得个个面黄肌瘦，皮包

骨头。就是这样，日本鬼子还常常找岔儿，用各种刑罚来折磨我们。有一次，监工的鬼子丢了糖，赖我们偷了，让我们十几个人跪下互相打嘴巴。我们不打，日本鬼子就拿大棒打我们。我是排头的，头一棒子就把我打昏过去。还有一次，监工的鬼子嫌我们干活慢，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腿上压上四十多斤重的箱子，还让我们双手拿着大酒瓶子、竹扫帚等举过头顶。两臂弯一点，鬼子就给一棍子。当时，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窝着火，憋着气，想找个机会和鬼子斗。有一次，鬼子监工让我用机器碾豆饼喂马，我把锁链子塞进粉碎机里，机器轰隆一声，就不转了，停了两天工。

直等到一九四五年“九三”胜利，我们才跳出了这座人间地狱，又回到饭店。

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又进了长春，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们工人象过去一样，仍旧受着资本家的剥削。

有一天，我正在炒菜，有人告诉我，说我妻子来了，在一家家具店等我。我赶到那里一看，只见她脸色焦黄，身上衣服破烂得不成样子，只离别三年，二十多岁的人，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了？她一见我，就哭起来。过了好大一会，才向我告诉她的不幸遭遇。

原来她离开我回到家乡以后，拖着怀孕的身子在地里干活，送粪、挑水、栽地瓜，什么重活都得干。吃的是野槐叶，又累又饿，不久就病倒了。病中生出个小女孩，孩子没吃一口奶，到第六天就死了。孩子一死，妻子病更重了。有

病沒錢治，只好硬挺着。病好之后，又給地主干了两年活，生活仍很困难，她只得又离开家乡，跟着同乡来长春找我。在国民党反动派統治下的长春，穷人还是沒有活路。一九四八年，妻子生下了第二个孩子不久，这孩子就拉痢疾死了。他媽一股急火上攻，再加上营养不良，得了眼病，一到下半晌就什么也看不見了。紧接着飯店又倒閉了，我們的生活更沒有着落了。

正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候，长春解放了。解放后，我当上了国营飯店的厨师，在党的培养下，一九五四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五九年五月，我坐着挂有我国国徽的国际列車，到国外去傳授烹調技术。象我这样一个在旧社会被人踩在脚底下的“小厨子”，今天却受到党和人民这样器重，得到这样的荣誉，真是做梦也沒有想到。

現在，我老伴的眼睛全好了。我的大儿子已經是中学生了。看看現在的幸福生活，再想想过去，我对新社会更加无比热爱。現在，我虽然快五十岁了，可总感到有用不完的勁，我决心要为党为革命事业做出更大的貢獻。

筵席旁的辛酸

——齐齐哈尔市饮食业四级技术服务员纪信鹤家史

崔捷整理

—

纪信鹤老家在山东省招远县，靠近渤海边上的纪家村。纪信鹤的祖父、叔父、哥哥，都是旧社会饭馆跑堂的出身。在旧社会，跑堂的内受掌柜的剥削和压迫，外遭特务、警察的欺榨和侮辱，挣来的很少几个钱，根本就不够养家糊口的。纪家祖孙三代饱尝了这个行业的苦辣与辛酸。

爷爷纪华馨十五岁时，就到北京前门外打磨厂一家饭馆学徒。父亲做过洗衣工人，拉过三轮车。叔父纪松梁在十五岁那年，也到北京进饭馆学徒。叔父在北京三年满徒，挣钱很少，听说关东好混，就一狠心闯了关东，于一九三五年来到齐齐哈尔，在一家大饭馆同兴园当了跑堂的。

纪信鹤三岁死了母亲，就留在祖母的身边。在纪信鹤刚记事的时候，爷爷从北京回来了。这个从十五岁住饭馆，六十多岁才离开饭馆的老人，受尽了资本家的压榨和凌辱，变

得老迈不堪了。他空着手离开家，又空着手回到家，家里仍然是吃糠咽菜，后来慢慢地竟连菜粥也吃不上了。爷爷浑身肿得不象样子，还要天天出去要饭。

苦日子又熬了两年，大人小孩饿得实在活不下去了，纪信鹤的哥哥，十六岁的纪好鹤也闯关东，投奔叔父纪松梁，也入了同兴园当学徒。

爷爷自打要饭以后，身板更坏了，终于在纪信鹤十二岁那年去世了。爷爷死后不几个月，奶奶也去世了。这时家里只剩下纪信鹤一个人，更没法生活了。就在这年冬天，他穿着单薄的衣裳，随着一位闯关东的乡亲，也来到齐齐哈尔投奔叔叔纪松梁。

二

齐齐哈尔老名字叫卜奎，原是嫩江边上一个小小的渔村，经过百余年的演变，逐渐有了个都市的模样，到了日伪统治时期，市面上大小饭馆已有二三十处。“同兴园”是其中较大的一处，专办上等宴席，招徕“显官贵客”。

纪信鹤找到了叔父纪松梁。呆了几天，纪松梁就领着他去找同兴园的老板侯介臣，想让他同兴园找点活干。可是侯介臣把肉蛋似的脑袋一“卜楞”，说啥也不肯留。纪松梁心里很生气，但也只好耐住性子，同侯介臣商量说：“侯掌柜，我侄儿在老家过不下去了，大老远的奔来，求你把他留下吧！”侯介臣嘿嘿一阵冷笑说：“我这没闲饭养活他！”

紀松梁說：“剩菜剩飯，‘折羅’的東西也夠他吃的了！”侯介臣白眼珠子一翻，哼了一聲說：“剩菜剩飯能攤到他名下？”無奈，紀松梁只好把信鶴領回家去。又過了幾天，偏巧櫃房缺個打零雜兒的，紀松梁又再三央求，侯介臣才勉強答應讓信鶴試試看，不中用再領回去。

從此，紀信鶴得每天跑街、下請帖，給掌柜的鋪床迭被、給客人點煙倒茶，晚上人家打牌，紀信鶴要整夜侍候……，而且經常挨打受罵。就在他上工的那天，紀信鶴因為剛到櫃上，不知干啥活好，剛站着發怔，這時候王掌柜倒背着兩手從外面走了進來。他一見紀信鶴，明知故問地說：

“這是誰家的小孩？”有人告訴他：“這就是紀松梁的侄兒！”他用鼻子哼了一聲：“用這樣小孩能干屁事，還不是白吃飽！”然後冲着紀信鶴說：“喂，這不是養大爺的地方，把地掃掃！”紀信鶴拿起身旁的笤帚嘩嘩地掃起來。因為沒洒水，屋里起了點灰塵，王掌柜就大喝一聲，上前一脚把信鶴踹了個跟頭，瘦弱的紀信鶴，半天才從地上掙扎着爬起來。旁邊的人怕他吃虧，趕緊把他拉到外面去了。

第二年夏天，紀信鶴又讓侯老板打得病了一場。那天，紀信鶴熱得頭暈腦脹，看見街上有賣冰棍的，他覺得吃根冰棍涼快涼快會好一些。他瞅瞅掌柜的不在，急忙開門出去，到街上買了根冰棍，站在門外剛咬了兩口，侯老板突然從屋里走了出來，扯着紀信鶴的耳朵拉到屋里，乒乒就是兩撇子，並罵道：“小饞鬼，還想吃冰棍兒，老子叫你吃文明棍兒！”

一边罵一边走进柜房拿起文明棍，气势汹汹地奔紀信鶴打来。紀信鶴一看不好，便朝西厅跑去。这一下子更触怒了侯介臣（在旧社会，学徒的挨打，不准跑，不准动，得老老实实地挺着），他一边罵一边撵。紀信鶴被撵得沒路跑了，就窜到后院，直奔角門儿。侯介臣見紀信鶴要上街，就生了介心。因为外人都知道他好打徒弟，要再沿大街撵徒弟，面子上也不好看，就站住不撵了。可是，他眼睛瞟着紀信鶴，看見紀信鶴走进角門旁的小屋里，就几步窜了进去，一把抓住了紀信鶴，眼里露出凶光，手中的棍子雨点般落到紀信鶴身上。这时，王掌柜的站在外边，拉着长声說着风凉話：“簡直无法无天，打两下子竟敢抬腿跑了！这不管管还了得！”他这一加鋼，侯介臣更象瘋了似的。几棍子就把紀信鶴打得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了。紀信鶴那瘦弱的身子，怎能抗住这种折騰呢，他病倒了。他恨透了侯介臣，就让叔叔帮他想办法离开这个火坑。叔叔叹口气說：“我闖了半輩子，侍候人的事儿到哪也不容易呀！”

同兴园是一家大館子，館子里的工人給侯介臣賺来的錢，象流水一样地淌进他的腰包，供他享受，可是工人的工錢却少得可怜。干了十几年的老跑堂的一个月的工錢仅有五六元錢；紀信鶴每月只挣两元錢，加上分的二厘小柜（同兴园小柜十厘为一份儿），干一年活，除了吃飯，連件衣服也做不上。同兴园不仅工錢低，老板們还在“小柜”上打算盘。侯介臣这个家伙，不干活，可“小柜”錢却要分一整

份儿，他后屋供的财神爷也要分一整份儿，这叫做财神股。自然财神爷这份儿也落进侯介臣的腰包了。

三

一九四四年，纪信鹤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侯介臣就让他到饭厅去学跑堂的。纪信鹤想不干这一行了，他亲眼看到了一些老跑堂的悲惨遭遇。爷爷老了的时候，被老板撵出大门，落个冻饿而死！再说，当跑堂的不仅要受老板的气，还要受那些特务、警察的气。可是不干这一行，又没有第二条出路，只得忍气吞声地干下去。

纪信鹤认了师傅，练了几天，师傅就让他去搵座儿。有一天，进来两个穿黄呢子衣服、挂洋刀的警察。师傅让他上去照座。他和两个警察应酬几句，点好菜，端上来，两个警察大吃大喝起来。吃过饭等他把账单往上一递，其中那个高个子警察噗地一口把漱口水喷了一桌子，骂道：“睁开你的瞎眼，老子吃饭多咱花过钱，找你们老板来！”

同兴园虽然有势力，但伙计受了欺负，老板是不管的。徒弟挨特务、警察打骂，谁敢去找老板。老板一出来，还不是怪徒弟侍候不周，轻了申斥一顿，重了就要辞退。徒弟惹的事师傅要兜着。这时，纪信鹤的师傅忙走出来，好歹才把两个警察劝走。当天师徒两人没有分到小柜，就算赔了那两个警察的饭钱。事过之后，师傅告诉他，在这个世道侍候人，要学得“精明”些，要学会见啥人说啥话，客人吃完了

不要忙着递賬单，要客气地說：“我候了吧！”这是应酬話，可要說的象真的一样。

又有一天，来了两个横眉竖眼的家伙，师傅指点紀信鶴說，这是特务科的特务，要留心侍候。他忙迎上去，擦桌子倒水，請他們点菜。酒菜端上来了，他提心吊胆地站在一边，看着这两个家伙吃饱喝足了，忙去收拣碗筷。一个家伙嘴里叨着一支烟，眼望着天花板說：“小二，算賬！”紀信鶴記住师傅的話，忙客气地說：“你不方便我候了吧！”話剛一出口，那家伙乒乓就打了他两耳光子，气哼哼地說：“你候了？你掙多少錢，別他媽瞧不起人，瞎了眼，快叫你們掌柜的来，我要当面教訓教訓你这个小崽子！”师傅又急忙走上前說：“二位先生不要見怪，他人小不会說話，往后我們好好管教他。”那家伙好象气消了些，罵罵咧咧地坐下了。可是另一个家伙却站起来說：“走！既然这小子爱說大話，他候了，候就候了吧！”拉起打人的那个家伙，抬屁股就要走。师傅忙上前一拦，軟中挂硬地說：“二位怎能和小跑堂的一般見識！您手丫巴漏的錢也比他掙的多，請二位候了飯錢吧！”这两个家伙本来是混吃喝的，师傅这么一說，弄得那两个家伙理屈詞穷，半天說不出話来。最后，还是打人的那个家伙橫不讲理地說：“今天我倒要看看說大話的小崽子有啥样靠头，你不就是要錢嗎？走，咱們找个打官司的地方去！”紀信鶴气得眼睛通紅，紧握着拳头說：“走就走，你們凭啥吃飯不給錢！”师傅一看，和这些人打交道，哪有理



讲，只好拦住紀信鶴，眼睜睜地看着那两个家伙出了門。

晚上，师徒俩又沒有分到小柜。师徒俩都非常气愤。伙計們也紛紛議論說：“这样下去，这碗飯还能吃嗎！”

解放后，老板侯介臣不敢再欺压工人了。一九五〇年，同兴园改为国营食堂，紀家叔侄成为国营食堂的服务員。他們想到自己現在是为人民服务，感到越忙越高兴。

现在，紀信鶴的叔叔当了国营第一食堂（过去的同兴园）的副經理；哥哥紀好鶴在国营制材厂当炊事員；紀信鶴入了党，成为四級技术服务員，在齐齐哈尔飲食业服务职业学校当教員。想想过去，看看今天，他們都激动地說：“沒有共产党，我們一家人哪能有今天啊！”

徒工的苦难

哈尔滨市道外青年理发馆主任 张相国 口述
历声整理

我是哈尔滨市道外青年理发馆的主任。我们理发馆里，有一些是老理发工人，也有一些是才学理发不久的青年人。我们都感到自己的岗位是光荣的，工作是愉快的。每当我看到顾客们满意地离开我们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联想起我在旧社会时的苦难的理发生活。

打我记事的时候起，我就知道我的父亲是理发工人，哥哥也是理发工人。在旧社会，他们饱受欺凌压迫，被人称做“下九流”、“臭剃头的”。理发工人的家庭更是苦难不堪。那时我家住在巴彦，家里一共有八口人，父亲挑着剃头挑子走街串巷，早出晚归；二哥夹着工具包东奔西跑，到处奔波；另外，加上我的母亲给一家磨房做零工。就是这样终年累月地劳累，到头来还是摆脱不了贫困。

无奈，在一九三六年，也就是在我九岁那年，爹娘把我送到巴彦西北金河堡屯的地主张大马鞭子家放猪。原先讲的

是，只管放猪、放牛，可是三天过后，張大馬鞭子翻臉不认賬，什么活都让我干。每天三星还老高，他們就把我叫起来，燒火、挑水、劈柃子、餵猪食、喂猪、起牛圈……反正是在他家里，沒有做不到的活。一天到晚累个賊死，直到別人睡了，我才能躺下。

到一九三九年，眼看着讲的三年活就要滿期了，我心想，这会可算熬出头了。就在我暗自欢喜的时候，不料，一天夜里，一条小牛犢忽然得病死了。張大馬鞭子一見就火了，那时我还正在睡觉呢，張大馬鞭子扯着我的耳朵，把我拽到牛犢跟前就暴打起来，一直打得我昏迷不醒。張大馬鞭子打了我还不甘休，又依着死了牛犢为借口，不仅三年的工錢一个不給，还硬逼着我，給他多干半年活。在那个社会里，穷人是有苦沒处訴的，我只有含着冤恨給他干完了，才算了事。

穷人家里是养不起閑人的。我回到家里以后，家里仍然依着父亲和哥哥在外面理发掙錢維持生活，常常是吃了上頓沒有下頓。在生活的逼迫下，在我十五岁那年，也走上了父亲和哥哥所走的道路。

来到哈尔滨以后，經過我二哥同道外信发东理发館一再說合，苏掌柜才答应把我留下来。接着在农历七月十五那天便立下了字据。字据上写着：中途不能退約，出了事保人賠償損失，有了天灾病业掌柜不管，錯犯“店規”打死无論……这叫什么契約呀，其实与卖身契根本沒有有什么不同。我

的学徒生活也就从此开始了。

信发东有十六七个劳金、徒弟。凡是到那里去的徒弟原来姓什么叫什么，掌柜的一概不管，一律改称为“小”字辈的，我排行第五，所以就管我叫小五。

信发东的营业时间是早八点至晚十点，劳金每天要干十四个小时的活，徒弟干活的时间就更长了。我每天早晨四五点钟就得起来，擦地板、玻璃、镜子和桌椅板凳，提水烧锅炉……忙完了前边的活，还得到后楼苏掌柜家里倒尿盆、刷痰桶、打洗脸水、收拾屋里屋外。里里外外忙完了，营业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所以经常忙得我顾不上吃早饭，就得到店堂迎客、递手巾、倒脏水、扫头发……做这些店堂里的活还不算，掌柜家里的跑街打杂的事也得我来干，一直忙到晚上十点多钟落了幌，别人都走了，我还得洗所有的手巾和围布。等我干完这些活也就十一二点钟啦，每天只能睡四五个钟头的觉，一天到晚连累带困。记得，那是一九四三年夏天的一个晌午，把我熬困得实在受不了啦，趁着店堂里人不多的时候，打了一个盹，不曾想被掌柜的发现了。铁石心肠的苏掌柜，抡起藤棍劈头盖脑地向我打来，一直到他打累了才停下来。

掌柜的为了他的生意，白天不许学徒的学手艺练功，晚上落了幌以后才许徒弟学手艺练功。为了学手艺，我没有少挨打。有时因为实在太困，练功时打个盹，被掌柜的看见了，不是一顿暴打就是一顿臭骂。有时掌柜的还让我给他捶

背、捏脚，每次捶背、捏脚都是在十一二点钟的时候，困的我直打晃，稍一不慎，也得挨打受骂。

做学徒的一年三百六十天，哪天都有干不完的活，逢年逢节更忙更累，挨打挨骂的事也就更多，顾客要你侍候，掌柜的来了亲戚朋友也要你侍候，掌柜的晚上打麻将还要你侍候。

“学徒学徒三年为奴”，这句话是苏掌柜经常讲的，他使唤徒弟就跟对待奴隶一样。

学习理发这个手艺，只要七八个月的时间，一般的剃光头、理分发、刮脸等活也就能初步掌握了，这时掌柜的就叫我们做“票活”（给掌柜的亲戚朋友做活）。我只学了六个多月手艺，掌柜的就叫我给顾客理发。掌柜的叫我这么早就给顾客理发，并不是想叫我多学点手艺，而是要从我们学徒的身上多得一些钱。原因是掌柜的雇劳金，劳金要劈成（一般的是三七劈成，掌柜的拿七成劳金拿三成），而徒弟是不劈成的。这样徒弟挣来的钱，就可以全部装进掌柜的腰包。我从一九四二年夏天到信发东学徒，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满徒，三年的时间里，白给掌柜的做了两年半活。

徒弟，在旧社会，不仅要受掌柜的压迫和剥削，同时还要受社会上的那些警察、特务、地痞、流氓的敲榨和欺压。当时，道外十六道街有个伪警长叫张洪茂，这小子长了一副凶相，是一个有名的恶棍。他每天扒开眼睛就到信发东洗脸，早晨、中午、晚上一天来洗三遍，掌柜的总是叫我来侍候他。这小

子非常挑剔，尽找斜碴：第一，水要一清见底；第二，肥皂要香；第三，毛巾要新……如果有一样不合他的心思，他就会马上翻脸，不是打就是骂。有一次他硬说水有点不清，洗完就大吵大闹起来，上边用手指着我的脑袋骂：“臭剃头的……”下边就用脚来踢我。

一九四三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们正在后屋吃饭，突然走进一个人来，他见大家都在屋里吃饭，便举起文明棍在每个人的头上敲了两下，嘴里还不干净地说：“快他妈地吃……”我抬头一看，这人身穿协和服，脚登马靴，一脸横肉，留着一撮小黑胡。这时我就把他让到店堂说：“给您刮刮还是理理？”他瞪着眼睛说：“你是干啥吃的，这还看不出来？”我在他的脑袋上端详了好一会，见他头发象新理不久，下巴上没有胡茬，一时真摸不清该怎么办好，只得硬着头皮，小心谨慎地给他刮了刮脸。刮完，他对着镜子左看右看，随后就对我瞪起眼珠子，抬手就打了我两个嘴巴子，说我刮的不象“日本式”胡子。打得我两眼冒金花、鼻孔流血。在屋里吃饭的劳金，听到外面打了人，就赶紧跑出来劝阻，好歹算把他送走了。他走后我才知道，原来这小子是警察署的王警佐，外号叫“王扒皮”，是道外有名的坏蛋。

那时，我们最怕过星期天。到了星期天，街里更加骚乱，那些宪兵、警察、特务、流氓就象老鼠和臭虫似地钻了出来，找上门来理发刮脸的也就更多了，我们说不上什么时候就会遭上一场横祸。

有个星期天，大家都在低头忙着干活，进来个伪军官，没等大家向他打招呼，他就硬说我们怠慢了他，就大骂起来，“我是江上军上尉，老总来了，不打你们不认识……”说完，就叫我们排起队来互相打嘴巴子，我们不打，他就自己动手打。当时，我站在队的后边，顺着后门就躲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便绕到前门回来，我刚迈进门坎，就被那伪军官堵住了。他边打边骂，“小兔崽子，叫你跑，我叫你来双份的……”躲不但没躲过去，反倒被打的最重。最后还是把劳金徒弟都打完了才算拉倒。

平时是这样，一遇上天灾病业那就更难啦。那是在信发东学徒的第二年夏天，我的两条腿上生了毒瘡，瘡口潰烂，从膝盖以下都肿了，没钱医治，实在没办法了，就找掌柜的，掌柜的不但不管，反而说什么“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闹病的”。瘡口里的膿血都流到脚面子上了，掌柜的还硬逼着我干活。有一天，我咬着牙忍着痛给顾客理发，刚理了一半，我就昏倒了。事后听别人说：我昏倒的时候，掌柜的还狠狠地踢了我两脚。从此，我就病得起不来了。瘡也越来越重，当时，听一个大夫说：必须赶快治，再耽搁时间长了，就非截肢不可。还是穷哥儿们心连心啊！就在这时，大伙凑了几个钱，给我买了点药敷上了。经过三个多月的时间，瘡才慢慢封口。后来，在我满徒的时候，欺压、剥削工人成性的掌柜的，又提出这件事，说我在养病期间少给他干活了，非得叫我把这几个月的工给他补上不可。经过大家说情，我现借钱

請掌柜的全家吃了一頓，另外，还补了一个月的工，这才了事。

解放后，我們理发工人翻身做了主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与关怀下，我，一个在旧社会被人踩在脚底下的“臭剃头的”，一九五八年担任了信发东理发館的公方代表。随后，信发东理发館也改为青年理发館。想想过去，再看看現在，真是天地之差。过去，我們学徒是受尽苦难。現在，我們理发館里的青年人，在为人民服务的光荣崗位上，愉快地工作，愉快地学习。看到这些，在我的心里总有一股高兴的劲头。十几年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中，我做的还很不够，可是却得到党和人民的多次表揚和鼓励。一九六二年十月，我被选为哈尔滨市服务行业先进工作者，一九六三年，又被选为哈尔滨市先进工作者；一九六〇年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我深深地感到，責任更加重大了。我下定决心，永远听党的話，为党的事业奋斗一生。

理发工人見新天

沈阳市正阳理发店理发員 马百元 口述

沈阳市服务业公司“四史”编写组 整理

离別泪

我是河北省宝坻县黄庄鎮人，出生于一九一七年。从我出生的时候起，家里就房无一間，地无一壠。爹和娘都靠給地主做活度日子。我一周岁时，爹給地主干活累死了。爹死后，我就跟着娘住在地主的磨房里。哥哥七岁时有病，連病帶餓死去了，姐姐才十三岁就送給人家做了童养媳。

娘做活的那家地主姓楊，叫楊老四，是我的堂姐夫，可是，他对我們母子的剝削照样狠毒。娘給楊家推碾子、拉磨、做飯、洗衣服，每天从早晨忙到深夜。我六七岁时就給他家放羊，每天早晨赶着羊群出去，晚上赶着羊群回来，背上还得背捆青草。吃的是殘湯剩飯，沒有剩飯就得餓一頓。就这样，白給他家干活，楊老四还見人就說这是照顾孤儿寡妇，給我們母子一碗飯吃。

一九三〇年，我十四岁了。娘不甘心让我白給地主做一

輩子牛馬，想讓我學個手藝，找個飯碗。就在這時，我們村西街有個張宗旺從沈陽回家，說他在沈陽開“鑫華軒”理髮鋪，招收徒弟。我娘就托人求張宗旺收留我學徒。經保人再三說合，他才答應了。但同時提出：拜師要立“徒弟狀”，在“徒弟狀”上寫明：“在學徒期間，投河溺井，車前馬后，打死勿論（即老板概不負責）。如有中途逃跑等情，每天得賠償伙食費二角五分，由承保人負責。”我娘為了讓我能找到一條謀生的路，只得含着眼淚在“徒弟狀”上按下手印。

我娘回到家里，把立“徒弟狀”的經過告訴我，當我聽到什麼“投河溺井……打死勿論”等字樣，渾身都起了雞皮疙瘩，心撲通撲通地跳着。但是有什麼辦法呢？我只好離開娘，到沈陽來學徒。



學徒苦

立過“徒弟狀”，我就是“鑫華軒”理髮鋪的學徒了。“鑫華軒”在沈陽太清宮西側。在我來到這個鋪子以前，他們已經收了七個徒工，還雇

用了一个“吃劳金”（拿工薪）的。在旧社会徒工干活不给钱、打死不偿命。所以，那些老板都愿意多收徒工，好从他们身上榨油。

我来到“鑫华轩”以后，名义上是学徒，可干的尽是一些挑水、生火、做饭、拉风匣，给老板铺床送被、倒尿桶等杂役活。特别是挑水，那时候的理发铺，哪有上下水道，得一担一担地挑净水来，挑脏水走。从天不亮起床，一直要忙到深夜十一、二点钟。

有一天，我困得实在睜不开眼了，出去倒脏水，站在脏水坑旁拄着扁担就睡着了。等惊醒过来，回去晚了一会，就挨了一顿骂。晚上“关板”以后，老板又罚我跪在地上，并叫来另外七个师兄弟，罚他们也跪在一旁。老板先是举起藤棍狠揍了我一顿，接着就厉声训斥道：“以后谁要再敢偷懒耍滑，就加倍处罚……”

谈到学理发，在那个时候谁教你技术？要问一声，老板就瞪起眼珠子骂：“你长着两只眼睛干什么！不会看吗？”师傅、师兄给顾客理发，我就得站在一旁瞅着，一会递刷子，一会递手巾，夏天还得给顾客搨扇子。晚上闭店收拾完屋子后，我们学徒的还得象过“鬼门关”一样，受老板的折磨。当时有句话：“老板管徒弟，下晚见。”这时，我们不是被罚跪，就是端手腕子，老板坐在桌前喝酒，让我们学徒的在一旁站着，平端起两臂，对着镜子练手腕子。有一次，我白天干了一天活，累得筋疲力尽，深夜练腕子功时，两只手臂痠

痛得厉害，我尽力忍耐着，一分、二分，十分、二十分，一直平端了半个多小时，实在忍受不了啦，刚垂下两臂，想喘口气，叫老板看见了，抡起藤条子，就照着我两只胳膊猛抽，藤条打下去，我胳膊上马上肿起一道道血痕。打完还得继续练，直练到深夜十二点以后，老板喝足了酒，要休息了，才一挥手：“睡觉去吧！”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徒工才算熬过了一天。我们徒工身上，哪个不让他剝去几层皮。

老板这样逼我们练腕子功，并不是出于好意，而是为了让我们早练好功夫，早给他们挣钱。我学徒的第二年，老板就拨给我一副理发挑子，让我成天挑着挑子，敲着“唤头”，串大街，走小巷地去理发。一天挣一元八角的，都要如数交给老板。出门理发，就难免有时多挣一两角，有时少挣一两角。可是要有一天交钱少了，老板就盘问痛骂，有时还得挨打。

等到我的理发技术学得比较熟练了，就得跟着师兄出去给老板剃包工活。挣的钱全部归老板，而老板给我们吃的却是些红高粱米粥，苞米面掺豆腐渣的饼子。

我在“鑫华轩”受了整整三年的煎熬。可是到了三年期满，老板还是不肯轻易放过我。说三年学徒，逢年过节，头痛脑热，还不得占去两个月，得补足天数。就这样，又硬逼着我给他白干了两个月活。最后，还要我请谢师酒。我又只得用学徒三年挣的几个钱，办了两桌酒席，请老板和他的狐

朋狗友大吃一頓，才算滿徒。滿徒后，我就离开了“鑫华軒”，凭着一把剪子、两把刀子謀生活。

理 发 难

一九三四年，我流落到吉林省扶余县五家站，在“合发堂”理发。后来，又回到沈阳，在“富貴軒”干了几个月，到一九三八年，我二十二岁，又經人介紹，在大舞台（現沈阳劇場）东隔壁“永合堂”理发。

“永合堂”的老板杜永春，是个甩手掌柜的，一天到晚淨抽鴉片烟，不干活。他家是河北省宝坻县的一个地主。他在“永合堂”，經常雇有五六个“吃劳金”的，还收了四五个徒工。他就从这些理发工人身上榨取血汗，供他一家人吃喝玩乐。杜永春有一套剝削理发工人的狡猾手段，工人就給他起了个外号，叫“老肚皮”。他的小老婆，是他欺騙、剝削工人的帮手。所以，工人又給她送了个外号，叫“小摆设”。

我初到“永合堂”，讲定工薪每月十五元。干了几个月 after，一天，老板突然把我叫到后屋說：“咱們是老乡，人不亲土亲，我每月額外給你增加两元錢，不要告訴別人，好好干，将来‘永合堂’发了財，有你的好处。”我当时感到很奇怪，后来才知道，他是耍花招，一方面麻痹我們，讓我們好好給他卖命；另一方面，又利用这几个錢，来破坏我們理发工人的团结，让工人之間互相嫉忌、不团结。

“永合堂”老板还有一手狠毒的剥削工人的手段。就是一到春节期間，一是理发鋪子里沒有生意，二是工人劳累一年，手里都有点錢。老板看准这是个好机会，就生逼硬拉工人賭博。工人们也都知道，这是老板在变相向工人要錢。可是，不干，他就要撵你走，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一支起賭場，就要給老板抽头分紅。从正月初一賭到正月十五，錢都被老板刮进了腰包。有一年春节，理发工人馬德生只一晚上就輸掉了一年的工薪。到了这时，老板又堆着笑臉，捧出賬本說：“沒有关系，都是老东老伙的，誰缺錢就在柜上拿，記筆賬就行。”只要誰在白紙上落下了黑字，就象在脚上拴上了一根繩子，第二年你又得給他們去卖命。我本来不賭錢，但是每年春节也得被迫让他剝削去一些錢。

“永合堂”除了动軟刀子外，还动硬刀子。就是包伙食，他們也想尽办法从中剋扣。他們每天只給工人喝兩頓稀粥，每頓只給一小碟菜，工人叫“二十五顆豆芽”。就是这样，老板也不让你吃頓安靜飯。一到吃飯的时候，“老肚皮”就挂个棍子在屋內串来串去，瞪着眼睛罵：“他媽个巴子，都什么时候了，还吃！”明的是指学徒罵，实际上就是罵給我們“劳金”听的。

每年一到农历腊月二十三以后，理发鋪子就忙了。按慣例，这时就要給我們換飯，我們都叫这是“拚命飯”。有一年腊月二十三日，老板想从我們身上多刮几个錢，偏偏不換飯，早晚兩頓还是紅高粱米稀粥，我們都不肯吃，也不干活

了。“老肚皮”先来硬的，拄着个棍子，在铺子里来回串，见到我们就骂：“媽个巴子，都是贱骨头！不干就滚！要干，就得吃高粱米籽。”这一次，我们都齐心了，谁也不肯去干活。“老肚皮”一看来硬的不行了，就缩到后面去，让“小摆设”出面来软的，向我们道歉，并答应换饭。第二天就给我们加了酒和肉。但是，“老肚皮”总是怀恨在心，第二年还没过正月十五，就到处雇人，想把我們“一堂下”（就是集体解雇）。结果，由于没有雇到人，才把我们留下了。

在那个时候，我们理发工人，不但受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还得受那些反动统治阶级的爪牙——宪兵、特务、警察的欺凌。

有一次，一个宪兵，长一脸横肉，大胡茬子硬得象猪鬃，两只眼睛露出凶光，摇摇摆摆地走进屋里，往椅子上一躺，两腿一跷，就要刮脸。徒工郭文贵一看这凶相，有些害怕。给他刮脸时，心一慌，刮翻了两根胡茬，渗出了血津，这家伙举手就揍郭文贵耳光，我看到这情形，忙赶过去，一边护住小郭，一边好言劝说宪兵。那个宪兵转过手来就揍我，并吼骂道，“臭剃头的，刚才你干什么去了？”揍完，还要我给他刮脸，刮完脸后，这个宪兵抬腿就走，分文不给。宪兵走后，老板还埋怨我没有要钱。在那个社会里，象这样的事经常遇到，我们理发工人就得两头受气。

最使我难忘的是，有一年夏天，我得了伤寒病，想向老

板借两块钱买服药吃。“老肚皮”把眼睛一翻说：“你在这儿怕养不了吧！”说完，转身就走了。这明明是撵我呀！叫我到哪里去呢？后来，还是由伙伴们一起出面向老板说情，他才勉强同意我留在铺子里养病，并迫使我每天早晨天一亮就得起身，收拾起铺盖卷，扶着墙壁摸到中央大旅社（现沈河旅社）门前空场上去晒太阳，一直要等到深夜，“永合堂”闭店了，才让我回铺子睡一觉。这凄惨景况使我联想起一段往事。

我有个叔伯哥哥马百泉，原也是个理发工人，他得了病，老板就把他一脚踢出铺子不管。他无处安身，就流落到大西门外工夫市住小店，病越拖越沉重，在临死前两天，还托人捎信让我去见一面。我向老板请不准假，过了两天，我赶到工夫市去探望他，还没有进小店，就见前面垃圾堆旁僵卧着一具死尸，旁边还有一道刚拖出来的印迹。这不是我的叔伯哥哥马百泉吗。死得可太惨了！我的两腿瘫软了，脑袋发麻了，悔恨来晚了。

这一桩桩血和泪的事实，教育我开始认识了资本家的狠毒嘴脸。

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物价一天数涨，满街特务、警察、伤兵，他们理发都不给钱。在那个时候，物价上涨，粮食不好买，老板就改变了剥削手段，铺子里不管伙食，和理发工人分成，我每月挣来的钱，得分给老板六成，我得四成。常常忙碌一天，还糊不上一个人的嘴，苞米糊涂

都喝不上。这时，“老肚皮”一看沒有更多油水可榨了，就自己弄了一笔錢，回原籍河北过他的地主生活去了。

珍惜新生活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沈阳解放了。从此，劳动人民翻了身，我也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是一九四〇年回到家乡結的婚，爱人吳佩芝，是一个貧农家的女儿。在那个黑暗的旧社会里，一个理发工人养活不了家口，我們一家三口人，就分住在三处，各謀生活。解放后，一九四九年我才把娘和爱人接到沈阳，一家人团聚了。

一九五二年，我轉到沈阳市文教合作社理发部，当了国营企业的理髮員。

一九五六年冬，我病了，沒有上班，工資还照发。到了年三十，一家人都在欢欢喜喜地忙着过春节。这天，党支部書記和工会主席还来看我，問寒問暖，关心得无微不至。支部書記临走时还一再囑咐我要好好养病，他們又給留下了二十元錢，囑咐我們一家人好好过春节。我娘接过錢后，激动得流出了热泪，我更是激动得連話都說不出来。想起叔伯哥哥馬百泉的死，想起自己在旧社会有病，老板逼着我去蹲馬路……，将今比昔，我觉得这真是换了人間。我立下决心，今后一定要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党对我的关怀。

一九五七年，我轉到正阳理发店当理髮工人。一九五九年，我被評为沈河区的先进工作者，同年，还光荣地参加了

中国共产党。从一九六〇年起，我連續被評选为沈阳市和辽宁省財貿系統的先鋒工作者，一九六四年，被評选为沈阳市劳动模范，又被評选为沈阳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我的亲身经历，使我深深体会到，新旧两个社会是多么不同啊！想起旧社会，就使我更加热爱今天，更加热爱党和毛主席。

可是，干咱們这一行的，也还有些青年人，他們身在福中不知福，总是嫌当理发員“低气”，不好好学技术，不安心工作。我一有空闲，就給他們讲理发工人在旧社会的苦和新社会的甜，我說：“說理发工人是‘下九流’，这是旧社会統治階級对劳动人民的污蔑。在新社会，当理发員也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只要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是光荣的。我馬百元，在旧社会是理发工人。在新社会也还是理发工人。为什么在旧社会，我只有挨打受气的份，在新社会我却能經常和各行各业的先进人物坐在一起討論国家大事，这是我馬百元有什么能耐了嗎？不是的，这是社会变了，有党和毛主席的好领导，有了人民的国家，我們理发工人才翻了身！”他們听了这些話，激动地向我說：“馬师傅，我們过去想錯了。”

我今年四十九岁了。但是，我觉得越活越年輕，我要用自己的后半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修脚工人的今昔

吉林市第二浴池修脚技师 赵 斌 口述

中共吉林市委宣传部“四史”编写组 整理

一九六四年十月，我的高血压病又犯了，领导上让我到江南疗养所去疗养，浴池工会主席还亲自送我入院。在我住院期间，领导和同志们几次去看望我。对我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回想在我六十年的经历中，整整当了四十五年修脚工人。在旧社会里，干我们这一行的属于“下九流”。在新社会，我们修脚工人和其他行业的劳动人民一样，有了政治地位。这些年来，我只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党和人民就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我当选为市人民代表，被评选为省、市先进生产者，一九五九年十二月随市政协参观团到北京参观了十大建筑，……一九六一年二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每逢想到这些，我总忘不了当年父亲带我闯关东时的凄惨情景，忘不了我在旧社会里被侮辱受压迫的痛苦生活。

一九〇六年，我出生在河北省定兴县究室村一个貧农的家里，从我記事起，家里就过着缺吃少穿的穷日子。为了吃口飽飯，父亲給地主扛活劳累成疾，没办法，我在十二岁时就給地主放猪。好歹算帶出一張嘴去。一九二一年，我十五岁时，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父亲說：“你已經长大了，該掙錢养家了，咱們还是到外面找条出路吧！”于是，父亲就帶着我离开了家乡，到关东来投奔舅舅。坐船到了营口，就沒有錢买車票了，只好徒步从营口往沈阳走，我的双脚磨起了血泡。到了沈阳，才在亲友的帮助下，坐上了开往长春的火車。誰知上車以后，檢票的和铁路警察就来驗票。警察一看到我起的是半票，伸手就打了我两巴掌。父亲上前去解釋，他們不容分說就把父亲打得滿嘴流血，我气得恨不得咬他們几口。到了长春，下車后，兜里一个錢也沒有，父亲只得把身上穿的一件棉袄和仅有的一床棉被卖了，才坐火車到了吉林。

二舅丁占海和四舅丁佩石在吉林开了个澡塘子叫站海泉。在旧社会有錢人是不认穷亲戚的，舅舅虽然收留了我們父子二人，怎肯讓我們吃閑飯。他让父亲在浴池做飯，让我当杂役，給客人打手巾把、摆鞋趂拉。从早忙到晚，除了打杂以外，还得給舅舅家抱孩子、打水、倒痰桶，什么活都得干。有时候手脚稍慢一点，就得挨打受罵。成天忙个不停，只供吃两頓粗飯，一个工錢也拿不到。第二年我就跟师傅学修脚，那时候，师傅为了保住自己的飯碗，不肯把拿手活教

給徒弟。我学了三年修脚手艺以后，每月所得的工錢都得存在舅舅的柜上。后来，我母亲带着弟弟妹妹也来到了吉林，这时，我父亲已离开吉林，一家人的生活都指靠着我。我就去找舅舅要錢，他眼睛一瞪說：“你还想要錢，你爹走时拿的錢你还清了嗎？”我爹走时欠沒欠他的錢，我不知道，可他們就用这作借口，硬扣我的錢。为了摆脱舅舅的剝削，我便离开了站海泉。

在旧社会，浴池工人不仅受浴池老板的剝削，还要受那些官僚、警察、特务、宪兵的欺侮。他們根本不把我們当人看待，張嘴就罵，举手就打。

一九二六年，我在新海泉修脚，一天，税务局一个姓刘的科长来修脚。他穿着一件水獺領狐狸皮大衣，戴一副金絲眼鏡。我一看就知道是个不好惹的家伙，心想得多加小心，誰知心里一发慌，把他的脚划破了点皮。这个家伙就一脚把我踢倒在地上，接着又打我几个嘴巴，嘴里还不干不淨地罵着。当时我心里的怒火真有点压不住，可是为了养活一家老小，只得含着眼泪，装着笑臉賠不是。事过之后，新海泉的老板还怨我給柜上得罪了税务局的人，怕影响他的生意，要解雇我。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以后，汉奸、宪兵、警察更是橫行霸道，胡作非为，特别是星期天，那些宪兵、伪軍洗澡不仅不給錢，还动不动就打我們，罵我們，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遭到无辜的打罵、拘留或者是审問。一九四三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正在庆云池干活，草市分駐所的李警

长突然打电话把我叫去，到了派出所，我就问他有什么事，他拉着一副脸，气哼哼地说：“什么事？你自己做的事还不知道？”我说：“实在不知道。”他说：“实在不知道，就站在一边好好地想想吧。”我足足站了一个多钟头，站得两腿发痠，他才说：“行了，你回去好好想想吧！”我才离开了派出所。在那个时候，特务、警察经常利用职权，私自傳訊人、审問人，来显示自己的威风，为非作歹。一想起这不明不白的冤，我就憋气。可是在那个社会里，哪有穷人說理的地方啊？穷人有气只能憋在肚子里。

好容易盼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蔣匪軍又来了，同样是横行霸道，欺压老百姓。記得一九四六年秋天一个晚上，我正在樓上給客人修脚，只听得樓下一陣吵嚷声：“他媽的，修脚的在哪？”紧接着四个蔣匪兵端着枪闖到了樓上。我还没来得及回头，就被一个匪兵踢倒在地上，他們还罵我：“一个臭修脚的，架子这么大！”不由分說，就把我抓走了。他們把我带到了巴虎門外的匪軍司令部，才告訴我，是让我給他們的司令修脚。那些狗东西，就是这样的任意蹂躪我們。

在那个黑暗的旧社会里，我們不仅人格受侮辱，生活也沒有保障。我們修脚工人用的药品、工具都是自己的，只占用浴池里一点地方，可是得到的工錢，浴池老板却要扣去两、三成，甚至是四成。搓澡工人沒有工錢，全靠客人給几个“小柜”，就在那少得可怜的“小柜”里，浴池老板也得

分成。鍋爐工、打雜工的工錢和浴池里用的毛巾、茶葉費也都在“小櫃”里開支。當工人到了年老體弱的時候，就被攆出去。我親眼看到同行的王均、王斌、魏慶海等老工人都在年老多病的時候被解雇了。所以那時候我最怕失業。可是怕也沒有用，儘管我一年到頭忍氣吞聲地干，還是免不了被解雇。一九三〇年，我在第一池，勞累了一年，平時吃不到一點油水，臘月二十九還沒有改善伙食。大家實在忍不住了，一核計，商定在三十晚上一摔茶碗，就甩手不干。那天晚上洗澡的人特別多，老板一看大家都甩手要走，只好答應改善伙食。事後，老板認為我是領頭鬧事的一個，就處處找碴。我看在第一池呆不下去了，就離開了那兒。我走了以後，另外幾個工人也被解雇了。一九三一年五月間，我被逼到石家莊去謀生，在新明浴池耍了五年手藝，天下烏鴉一般黑，哪里的老板都想從工人身上多刮油水。我們修腳工人憑勞動掙來幾個錢，這家老板李明林坐分三成還不滿足，又要四六分成，大家都不滿意，我也很氣憤，就和老板頂了幾句。這樣我又被解雇了。一九三六年三月又回到了吉林。在那苦難的年月里，為了全家吃碗飽飯，我就這樣從關里到關外，又從關外到關里，來回奔波。

一九四八年三月吉林解放了，我們修腳工人才翻身做了國家的主人。今天，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發生了根本變化。每當我給顧客修完腳，他們臨走時總要和我握握手，說聲：“謝謝。”有時我失手把顧客的腳划破了皮，自己覺得很不

过意，可是他們总是安慰我說：“不碍事，沒关系。”我在浴池領導的支持下，还到中心医院学习了注射、消毒等医疗技术。現在，我們不光修脚，而且还能治疗几种脚病了。

在新社会，在党的领导下，不仅我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我的家庭生活也很幸福，我的大女儿一九五八年在哈尔滨农学院毕业后，分配在扶余县工作，小儿子也小学毕业了。在旧社会“下九流”的子弟連考場都进不去，我在旧社会也沒念过一天书，現在，我的子女不但能够念书，而且能够上大学，这都是党和国家的培养。沒有共产党，我們一家人哪能有今天。每当想到这些，我就告訴我的孩子，不要忘了本，要做革命的接班人，永远跟着党和毛主席走。